

# 六自與八自的若干問題

黃聖松\*

## [摘要]

本文針對西周六自與八自的內部問題作一探究，主要可分為下列五個部份：一、名稱定義，二、組成結構，三、指揮權問題，四、與「△自」的關係，五、八自的移防。具體結論有下列五點：一、西六自與殷八自是結合地域及族類兩種條件而命名，至於殷八自、成周八自只是在「隨地易名」情況下的不同稱法，實際上兩者為一。二、殷八自的指揮系統可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層級是由周天子派遣的重臣、諸侯擔任，第二層級是由這些重臣、諸侯的下屬擔任，第三及第四層級則是殷八自的師氏及殷人所組成。三、六自、八自的指揮權由周天子掌握，並由周天子派遣重臣出任總指揮官。四、六自、八自實際上是由西周金文中常見的「△自」所組成，六自實際是六個「自」、八自實際是「自」所組成的軍團。五、從周厲王之後，原本駐守殷地的殷八自移防至成周地區，故因而易名為成周八自，並自此常駐於成周而未再回駐殷地，其目的在於抵禦南方淮夷等外族的侵犯。

關鍵詞：六自、八自、師氏

---

\* 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語文系講師

## 一、前言

關於西周的軍事制度，一直以來都是治上古史學者們所關注的焦點，尤其是西周金文中所見的「西六自」、「殷八自」等問題更是討論的重點所在。目前所見的金文中共有十一器提及六自、八自，分別為小臣謎殷（《殷周金文集成》8.4238，以下簡稱《集成》）、<sup>1</sup>斿貯殷（《集成》7.4047）、<sup>2</sup>盞方尊（《集成》11.6013）、盞方彝（《集成》16.9899）、<sup>3</sup>禹鼎（《集成》5.2833）、<sup>4</sup>留壺蓋（《集成》15.9728）、<sup>5</sup>南宮柳鼎（《集成》5.2805）、<sup>6</sup>呂服余盤（《集

- 1 《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簡稱《集成》）定為西周早期，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以下簡稱《史徵》）定為昭王，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以下簡稱《銘文選》）定為康王，吳鎮烽《金文人名匯編》（以下簡稱《人名》）定為西周早期，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以下簡稱《斷代》）定為西周早期康王前後，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以下簡稱《年代》）定為昭王。本文依據《銘文選》、《斷代》及楊寬《西周史》之見，將此器定為康王時代。
- 2 《集成》定為西周中期，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以下簡稱《大系》）定為孝王，《史徵》定為穆王，《銘文選》定為西周早期，《人名》定為西周早期。本文依據《史徵》、《年代》之見，將此器定為穆王時代。
- 3 《集成》定為西周中期，《史徵》定為穆王，《銘文選》定為孝王，《人名》定為西周中期前段，《斷代》定為西周中期後段約當懿、孝之時，《年代》定為懿王。本文依據《銘文選》、《斷代》、《年代》之見，將此器定為懿王、孝王時代。
- 4 《集成》定為西周中期，《史徵》定為孝王，《銘文選》定為厲王，《人名》夷、厲時期，《年代》定為厲王。本文依據《銘文選》、《人名》、《年代》之見，將此器定為厲王時代。
- 5 《集成》定為西周中期，《大系》定為孝王，《史徵》定為穆王，《銘文選》定為孝王，《人名》定為西周中期後段，《年代》定為西周晚期。本文依據《通考》、《年代》之見，將此器定為西周晚期（厲王、宣王）。
- 6 《集成》定為西周晚期，《史徵》定為厲王，《銘文選》定為厲王，《人名》定為夷王時期，《斷代》定為西周晚期偏早宣王之前，《年代》定為厲王。本文依據《銘文選》、《斷代》、《年代》之見，將此器定為厲王時代。

成》16.10169）、小克鼎（《集成》5.2796）、<sup>7</sup>倭戒鼎（陳佩芬〈釋倭戒鼎〉<sup>8</sup>）、子犯編鐘（張光遠〈故宮新藏春秋晉文稱霸子犯和鐘初釋〉<sup>9</sup>），其中除子犯編鐘外，其餘皆為西周時器。以下依次將銘文逐錄於下：

（1）戲，東尸（夷）大反（叛），白（伯）懋父以殷八白征東尸，在十又一月，遣自鬯白，述東隳，伐海眉（湄），掣卒復歸在牧白。白懋父承王令，賜白率征自五鬲貝。小臣謏蔑曆，罌易（錫）貝，用作（作）寶尊彝。（小臣謏殷）

（2）□隳貯罌子鼓罌鑄旅殷，隳巢來攸（迺），王令東宮追以六白之年。（隳貯殷）

（3）隳八月初吉，王各于周廟，穆公又（佑）盥，立中廷，北鄉（嚮），王冊令尹，賜盥：赤芾、幽亢（衡）、攸（筮）勒，曰：用嗣六白、王行、參有嗣（司）：嗣土（徒）、嗣馬、嗣工（空），王令盥曰：翺嗣六白罌八白執（藝）。盥拜詣首，敢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益公寶尊彝。盥曰：不（丕）段（遐）不其（基），萬年保我萬邦。盥敢拜詣首曰：刺刺（烈烈）朕身，遯（更）朕先寶事。（盥方尊、盥方彝）

（4）禹曰：不顯赳赳皇且穆公，克夾召（紹）先王奠四方，韞（肆）武公亦弗段翌（忘）膳（朕）聖且考幽大叔、懿叔，命禹仆（肖）膳且考，政于井邦。韞禹亦弗敢愆（愆），賜（揚）共（恭）膳辟之命。烏虜（乎）哀哉，用天降大喪于下或（國），亦唯噩侯馭方率南淮尸、東

<sup>7</sup> 《集成》定為西周晚期，《大系》定為厲王，《史徵》定為孝王，《銘文選》定為孝王，《人名》定為孝、夷時期，《斷代》定為夷、厲時期，《年代》定為宣王。本文依據《年代》之見，將此器定為宣王時代。

<sup>8</sup> 陳佩芬：〈釋倭戒鼎〉，《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7年10月，初版），頁317-322。陳佩芬定為西周晚期。本文依據陳氏之見，將此器定為西周晚期。

<sup>9</sup> 張光遠：〈故宮新藏春秋晉文稱霸子犯和鐘初釋〉，《故宮文物月刊》1995年第13卷第1期，頁4-31。諸家均定為春秋時器。

尸，廣伐南或、東或，至于歷內。王適命西六白、殷八白曰：剿（撲）伐噩侯馭方，勿遺壽幼。隸師彌采（深）甸（會）匡（往），弗克伐噩。隸武公適遣禹率公戎車百乘、斯（廡）馭二百、徒千，曰：于匡朕肅慕，重（惟）西六白、殷八白伐噩侯馭方，勿遺壽幼。擊禹以武公徒馭至于噩，擊（敦）伐噩，休獲厥君馭方。隸禹又（有）成，敢對揚武公不顯耿光，用作大寶鼎。禹其萬年，子子孫孫寶用。（禹鼎）

（5）隹正月初吉丁亥，王各于成宮，井公內右（佑）習，王乎尹氏冊令習曰：更乃且（祖）考，乍冢嗣土（徒）于成周八白。易女（汝）秬鬯一卣，玄袞衣、赤巾、幽黃（銜）、赤鳥、攸勒、緜（鑿）旂，用事。習拜手詣首，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令（命），用作朕文考釐公尊壺。習用甸萬年眉壽，永令多福，子子孫孫其永寶用。（習壺蓋）

（6）隹王五月初吉甲寅，王才（在）康廟，武公有（佑）南宮柳，即立中廷，北鄉（嚮），王乎乍冊尹冊命柳：嗣六白牧、陽（場）大耋（友），嗣羲夷陽（場）佃史（事），易女赤芾、幽黃、攸勒。柳拜詣首，對揚天子休，用作朕刺考尊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南宮柳鼎）

（7）隹正二月初吉甲寅，備仲內右呂服余，王曰：服余，令女敗（更）乃且考事，疋（胥）備仲嗣六白服，易女赤蔽（芾）、幽黃、鑿勒、旂。呂服余敢對揚天【子】不顯休令，用作寶般（盤）盃，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呂服余盤）

（8）隹王廿又三年九月，王才宗周，王命善（膳）夫克舍（捨）令于成周，適正八白之年，克乍朕皇祖釐季寶宗彝。克其日用鬯，朕辟魯休，用甸康毳，屯（純）右（祐）眉壽，永令靈（靈）冬（終），邁（萬）年無疆。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小克鼎）

（9）鞞白慶易倏戒贗弼（弼）、鼯雁、虎裘、豹裘，用征于六白。用梛比，用獄次。（倏戒鼎）

(10) 隹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範(犯)宕(佑)晉公左右，來復其邦。者(諸)楚荊、大(太)上楚荊，喪厥帀，滅厥□。子範宕晉公左右，焮者侯得朝，不聖(聽)令(命)于王所，子範及晉公率西之六帀(師)，搏伐楚荊孔休，王克奠王立(位)；王易子範輅車、四馬、衣常(裳)、黼市(黻)、佩(珮)。者侯羞元(原)金于子範之所，用為穌(和)獻(且)鳴，用匡(安)用寧，用享用孝，用旂眉壽，萬年無疆(疆)，子子孫孫永寶用樂。(子犯編鐘)

六自、八自的「自」字，此字過去學者有不同的意見，有釋為「堆」者、有讀為「追」者，有釋為「次」、「餽」者，有釋為「屯」者；而目前學者則較一致認為應當釋為「師」字為妥。<sup>10</sup>但除此之外，對於六自、八自的其他相關問題至目前為止，都仍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筆者有感於此一問題對於上古軍事制度的重要性，不揣疏陋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請教於大方之家。

## 二、名稱定義

「六師」一名在先秦典籍數見，例如《毛詩·小雅·瞻彼洛矣》曰：「韎韐有爽，以作六師」；《大雅·棫樸》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sup>11</sup>又《國語·周語下》云：「王以黃鐘

<sup>10</sup> 釋「堆」者見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周自卣》；讀為「追」者見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三〈孟鼎〉；釋為「次」、「餽」者見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1959年第3期、丁山：〈叟敦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4分；釋為「屯」者見郭沫若：〈小臣單卣〉，《大系》；釋為「師」者見阮元：《山左金石志·史師鼎》、孫詒讓：《古籀拾遺·晉姜鼎》、于省吾：〈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自和八自及其屯田制〉，《考古》1964年第3期。以上轉引自王玉哲：《中華遠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初版），頁622-623。

<sup>11</sup>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頁478、557、691。

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sup>12</sup>皆是其例。至於在西周金文中共出現「六自」、「西六自」、「八自」、「殷八自」、「成周八自」等五個名稱，首先必須先釐清各個名稱的定義問題。最早研究這個問題的郭沫若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斨貯殷》（以下簡稱《大系》）中，認為銘文所記的「六自」「亦見禹鼎，彼言『西六師、殷八師』，『西六師』殆即『成周八師』之六，蓋以有戎事時，不必傾全師而出也。成周（今之洛陽）在殷（今之湯陰附近）之西，故稱為「西」也。由此可知，周克殷後，曾於成周與殷屯重兵，以鎮撫殷之遺民。此言追巢人以『六師』，則不知係『成周八師』之六，或『殷八師』之六耳。」郭氏在〈習壺蓋〉之下又云：「『成周八師』亦見小克鼎，彼云『王命善夫克舍命于成周適正八師』，蓋戎成周之師旅有八屯也。戎殷之舊地亦有八屯，小臣譚殷云『伯懋父以殷八師征東夷』，禹鼎『西六師、殷八師』是也。」<sup>13</sup>據此可知，郭氏認為金文中的「西」師即戍守於成周，「殷」師則戍守於殷地；且不論是「西」師或「殷」師，其師旅數目均為八師，稱「六師」者是指「八師」中的「六師」。不過郭氏的意見影響並不大，遵從其說者僅見於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斨貯殷》（以下簡稱《銘文選》）中。<sup>14</sup>但馬氏在書中的看法也並不一致，如在討論禹鼎時，則認為「西六師、殷八師」是「周室在西土和東土所駐的宿衛重兵，西六師駐宗周……殷八師駐牧野，見小臣譚簋銘。」<sup>15</sup>

其實馬氏的後說是前有所承，徐中舒在〈論西周是封建制社會〉一文中，認為「西周時代伐東夷則用殷八自，伐南夷則用成周八自。殷八自居殷舊都殷衛服之地，後來康叔之後稱衛，即此衛服之衛。成周八自在洛邑，成周為周

<sup>12</sup> 三國·韋昭注：《國語韋昭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3月，影印天聖明道本·嘉慶庚申讀未見書齋重雕本），頁101。

<sup>13</sup> 郭沫若：《大系》（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頁100-101。

<sup>14</sup> 馬承源：《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4月，初版），頁103。

<sup>15</sup> 馬承源：《銘文選》，頁282。

東都，直隸於王室。」<sup>16</sup>徐氏又在〈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中云：「西周一代於西土、成周、殷三處皆設有宿衛軍，在西土者稱為西六自，在成周者稱為成周八自，在殷故都者稱為殷八自。」<sup>17</sup>顯然徐氏是修正郭氏在《大系》中的看法，並提出西周共有三支宿衛軍共二十二師之說。雖然認同徐氏之見者不少，<sup>18</sup>但也有許多學者對徐氏的看法提出修正，認為「殷八師」與「成周八師」應當是同一支部隊，因此西周只有十四師的武力。<sup>19</sup>李道明提出一些看法，認為在目前所發現的金文中，從未有兩支八師共同出現者，而只能看到一支六師與一支八師共同行動，如上引（4）禹鼎即是；而且西周時軍隊時常

<sup>16</sup> 徐中舒：〈論西周是封建制社會——兼論殷代社會性質〉，《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9月，初版），頁931-970。原載《歷史研究》1957年第5期。

<sup>17</sup>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頁994-1020。原載《考古學報》1959年第3期。徐中舒：〈西周史論述〉（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4期，頁92-100。

<sup>18</sup> 楊寬：〈再論西周金文中「六自」和「八自」的性質〉，《考古》1965年第10期，頁525-528。楊寬：《西周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4月，初版），頁388。肖楠：〈試論卜辭中的師和旅〉，《古文字研究》第6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11月，初版），頁123-132。王貴民：《商周制度考信》（臺北：明文書局，1989年12月，初版），頁213。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初版），頁416。王人聰：〈西周金文中的殷八師與成周八師——讀金文札記〉，《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3期，頁76-77。劉雨：〈西周金文中的軍禮〉，《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初版），頁326-346。

<sup>19</sup> 于省吾：〈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自」和「八自」及其屯田制〉，《考古》1964年第3期，頁152-155。李學勤：〈鄆縣李家村銅器考〉，《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7期，頁58-59。李學勤：〈論西周金文的六師、八師〉，《華夏考古》1987年第2期，頁207-210。常征：〈釋「六師」，兼述西周王朝武裝部隊〉，《河北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頁35-38。孫作雲：〈說幽在西周時代為北方軍事重鎮——兼論軍監〉，《河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1期，頁31-49。楊善群：〈西周銘文中的「師」與「師氏」〉，《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2期，頁35-39。李道明：〈六師、八師新探〉，《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5期，頁64-70。許倬雲：《西周史》（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1月，初版），頁124。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初版），頁385-386。許兆昌：《夏商周簡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初版），頁164。

轉換戍守地點，故八師因駐守地點不同而有不同稱，如上引（1）小臣譔段即是一例。<sup>20</sup>

至於「西六自」之「西」字，學者們的解釋稍有分歧，如郭沫若認為其在成周之西，故名爲「西」；徐中舒、于省吾、李學勤、晁福林皆以爲西六自駐紮於「西土」，因此名之。<sup>21</sup>按：在典籍中常見「西土」一詞，如《尚書·牧誓》曰：「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又《康誥》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鄭玄注云：「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sup>22</sup>《逸周書·商誓》云：「肆商先哲王，用顯我西土」；莊述祖云：「顯我西土者，謂帝乙命王季爲西伯。」<sup>23</sup>此外，又見有稱「西伯」者，如《尚書·西伯戡黎》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鄭玄注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sup>24</sup>《孟子·離婁上》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趙岐注云：「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sup>25</sup>《史記·周本紀》曰：「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sup>26</sup>依據典籍的用法，可知「西土」實指周族發源的豐、鎬、豳、岐「先周經濟文化區」，<sup>27</sup>「西土之人」即是指在此地區蕃長生息的周族人民，因此我們可以說「西土」可爲周族的代名詞；而駐守於此的師旅即可冠上「西」字，以表駐守「西土」

<sup>20</sup> 李道明：〈六師、八師新探〉，《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2 年第 5 期，頁 64-70。

<sup>21</sup> 以上諸家論述著錄，請參考上文注釋。

<sup>22</sup> 題西漢·孔安國注、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 9 月，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頁 158、201。

<sup>23</sup> 黃懷信、張懋鏞、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12 月，初版），頁 482。

<sup>24</sup> 題西漢·孔安國注、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頁 144。

<sup>25</sup> 東漢·趙岐注、宋·邢昺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 9 月，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頁 133。

<sup>26</sup> 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 7 月，初版），頁 60。

<sup>27</sup> 李朝遠：《西周土地關係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 月，初版），頁 91。



之意。但有一點是前輩學者較為忽略者，即西土除了有表示區域的意義之外，也可以指稱周族之人；換句話說，「西六自」意即是由西土之人所組成，並且駐紮在西土之地，用以拱衛豐、鎬、豳、岐等宗周地區的師旅。

與「西土」相對，在典籍中亦有稱「東」者，依據傅斯年的考證，可以下表說明之：<sup>28</sup>

東	泛名	對「西土」言	雒邑稱東：東國雒（《書》）。
		對「中國」言	齊稱東：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詩·大雅》）
			魯稱東：乃命魯公俾侯於東（《詩·魯頌》）。
			夷稱東：用鄧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左傳·僖公十九年》）。
	專名	小東	其稱東者，就地望言，實對殷商都邑而稱小東，即周公所居以破奄者，在秦漢為東郡。
		大東	小東迤東太山南之區域，或兼及太山之東。

「東」字在文獻中的意涵較為廣泛，所指涉的區域也較「西土」為廣大。因此我們可以推論：由於「西土」原是周族舊地，其領土範圍較為明確，因此駐守的師旅可以用概括性較強的「西」字名之。而與「西」相對的「東」則是周族克殷之後接收的廣大區域，若以稱「西六自」的方式稱呼駐守東方的師旅為「東八自」，<sup>29</sup>則不能明確地表明駐守軍隊的地區，因此必須以更精確、指涉範圍更小的「殷」或「成周」以名之。

<sup>28</sup> 傅斯年：〈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後乃東遷〉，《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初版），頁79-90。原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

<sup>29</sup> 孫曉春在〈成周八師為東方各國軍隊說〉一文中，稱成周八師為「東八師」，常征在〈釋六師，兼述西周王朝武裝部隊〉一文中也主此見。然此說於典籍、金文皆無徵，不可信從。

此外，于省吾認為殷八自的組成份子為殷商之遺民，<sup>30</sup>我們以為這是正確的看法。其實在周族滅商之後，殷商遺民不但沒有被周人視為奴隸加以奴役，反而與之共享利益，我們可以從許多方面的材料加以證明。如學者們常引用的《左傳·定公四年傳》一段文字，<sup>31</sup>雖然內容是周人分封東方諸侯時將殷商族人分別置於魯、衛等地，似乎有分化殷人力量之用意；但在《左傳·定公六年傳》及《哀公七年傳》中仍提及殷人「亳社」，<sup>32</sup>足見魯地殷人雖然距離商亡已六百餘歲，<sup>33</sup>但在魯國仍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但在文獻中如此，從地下出土實物中也有所證明。呂文郁在《西周王畿殷商遺民考略》一文中，提出許多在西周王畿遺址中出土的器物均有殷商氏族的族徽，而且絕大多數都是殷商滅後的產物，製作時間從西周初年至西周晚期都有。<sup>34</sup>吳鎮烽有《周王

參見孫曉春：《成周八師為東方各國軍隊說》，《史學集刊》1986年第4期，頁1-4。常征：《釋「六師」，兼述西周王朝武裝部隊》，《河北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頁35-38。

<sup>30</sup> 于省吾：《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自」和「八自」及其屯田制》，《考古》1964年第3期，頁152-155。

<sup>31</sup> 《左傳·定公四年傳》：「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之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綉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頁947-949。

<sup>32</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961、1010。

<sup>33</sup> 此數字是依據傅斯年所推算。參見氏著：《周東封與殷遺民》，《民族與古代中國史》，頁70-78。

<sup>34</sup> 如1960年於陝西省扶風縣齊家村出土的39件（筆者按：有銘者28件）中氏家族銅器，1972年於甘肅省靈台縣白草坡出土黑伯與陔伯家族銅器，1975年、1976年於陝西扶風縣莊白村出土的伯紋家族和微氏家族銅器。參見呂文郁：《西周王畿殷商遺民考略》，《第

朝接納異族人才初探》一文，分析討論十餘例殷商遺民在西周王廷擔任職官的例子，<sup>35</sup>據此亦可證明殷人在亡國之後，仍然分享統治者的權力與義務，並未因此而墮入社會下層。其他學者如林黎明、楊善群、杜正勝、徐鴻修、楊朝明、何茲全也都有相同的看法。<sup>36</sup>甚至於西周初年周王室在經營東方和征服東南夷的幾次重大戰役中，皆可見殷人參與的記載。<sup>37</sup>關於此部份，我們則留待第三節再說明。總而言之，我們可以在此作一小結：「殷八呂」之所以在前冠以「殷」字，除了表明駐紮地區外，應當也與「西六呂」之「西」字一樣，也說明其組成人員的族屬；亦即表示此支師旅是由殷人組成，故名之為「殷」。

至於成周八呂之「成周」，學者們的意見則較為一致，均謂師旅駐紮於成周之故，因而冠之以地名成周。我們認為殷八呂與成周八呂應是同一支部隊的不同稱號，因為部隊從殷遷至於成周，故更名為成周八呂。這種「隨地易名」的情況一直到西周晚期仍可見，如《毛詩·大雅·韓奕》曰：「韓侯娶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鄭玄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sup>38</sup>由於周厲王被流放至彘地，而彘地在汾水流域，因此時人即以此稱呼厲王。又如《左傳·隱公五年傳》記曰：「曲沃莊伯以鄭

---

二次西周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初版），頁793-804。

- <sup>35</sup> 吳鎮烽：〈周王朝接納異族人才初探〉，《第二次西周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805-818。又見氏著：《考古文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10月，初版），頁247-254。
- <sup>36</sup> 林黎明：〈論周初對殷人的統治思想和政策〉，《北方論壇》1989年第2期，頁96-100。楊善群：〈西周對待殷民的政策縷析〉，《人文雜誌》，頁76-79。杜正勝：〈略論殷遺民的遭遇與地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3本第4分，頁661-695。徐鴻修：〈「釐（萊）僕」與「人鬲」〉，《第二次西周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09-312。楊朝明：〈試論西周時期魯國「殷民六族」的社會地位〉，《煙台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3期，頁76-79。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初版），頁22。
- <sup>37</sup> 日本·白川靜：〈周初殷人之活動〉，《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3卷·上古秦漢（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11月，初版），頁122-149。
- <sup>38</sup>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頁682。

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sup>39</sup>楊伯峻以爲翼即是晉國國都絳，而文中的翼侯即是晉侯。<sup>40</sup>又〈隱公六年傳〉記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sup>41</sup>鄂侯由於在鄂地即位，故晉人又稱此晉侯爲鄂侯。又〈僖公十年經〉曰：「狄滅溫，溫子奔衛。」〈僖公十年傳〉則記曰：「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杜預注云：「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sup>42</sup>蘇子本爲蘇氏，但因當時都於溫邑，故亦稱溫子，此亦可視爲「隨地易名」之例。<sup>43</sup>

在結束本節之前我們作一小結：六自及八自的稱號，應是結合地域及族類兩種條件而名之；即西六自爲指以「西土之人」組成，並戍守於「西土」的師旅；殷八自是由殷商遺民組成，並駐紮於殷商故地的師旅。至於成周八自，則是殷八自在「隨地易名」之下的另一種稱號，因此是同一支部隊的不同稱法而已。關於此問題，我們將留待第六節再詳論。

### 三、組成結構

在釐清六自與八自的名稱問題後，我們再就兩支軍隊組成的結構作一討論。由於相關的典籍文獻幾乎毫無線索可以追尋，因此只能有賴於地下出土資料；其中又以殷八自的記載較詳，因此我們便以此作爲基礎加以論述。以目前所見金文中，提及殷八自而時代最早者首推（1）小臣譚殷。銘文中提及伯懋父以殷八自征東夷，自「鬻自」往而回到「牧自」。學者謂伯懋父即成王

<sup>39</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60。

<sup>40</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年9月，再版），頁44-45。

<sup>41</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70。

<sup>42</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220-221。

<sup>43</sup> 劉師文強曰：「溫本蘇氏所轄之地，原稱蘇。蘇子後居于溫，又稱溫子，此氏隨邑改之一例。」參見氏著：〈以一軍爲晉侯（下）〉，《文與哲》第3期（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2004年1月，初版）。

時代衛康叔之子康伯耄，典籍中或稱為王孫牟。<sup>44</sup>此外尚有不同的看法，如徐中舒認為「白懋父亦當與周公旦同時，或年輩相去不遠之人」；<sup>45</sup>唐蘭在《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師旂鼎》（以下簡稱《史徵》）的說明中又推翻自己的前論，謂伯懋父有可能是祭公謀父；<sup>46</sup>彭裕商在《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以下簡稱《年代》）中則從器物年代上推論，認為應當是祭公謀父。<sup>47</sup>雖然這些說法未必能盡服人心，但在沒有更多的出土資料之前，我們暫時先從唐蘭、彭裕商之見，將伯懋父認定為祭公謀父。但必須要補充的一點是，依據《竹書紀年》的記載，祭公謀父被任命為卿士是在周穆王十一年，謀父的父親祭公在周昭王十九年時與昭王同征楚國。<sup>48</sup>由於小臣譚段記載征東夷之事是發生在昭王時代，即使伯懋父為祭公謀父，由於此時祭公謀父的父親尚在，因此謀父的身份並不是諸侯。

至於小臣譚段中所敘述征東夷之事，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如李白鳳、葉達雄即認為與周公東征為同一事；<sup>49</sup>何樹環則持保留態度，認為「沒有足夠

<sup>44</sup> 郭沫若：《大系》，頁 23。唐蘭：《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12 月，初版），頁 239-240。日本·伊藤道治：《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資料為主的殷周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10 月，初版），頁 127 註釋 10。楊寬：〈西周春秋時代對東方和北方的開發〉，《中華文史論叢》1982 年第 4 期，頁 109-132；〈商代的別都制度〉，《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4 年第 1 期，頁 81-86、38。沈長雲：〈論成康時代和成康時期的銅器銘刻〉，《上古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12 月，初版），頁 127-141。原載《中原文物》1997 年第 2 期。杜勇：〈關於令方彝的年代問題〉，《中國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頁 3-16。

<sup>45</sup> 徐中舒：〈滄敦釋考〉，《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頁 182-204。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 本第 2 分，頁 279-293。

<sup>46</sup> 唐蘭：《史徵》，頁 317。

<sup>47</sup>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 2 月，初版），頁 274-277。

<sup>48</sup> 清·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 年 5 月，再版），頁 314、307。

<sup>49</sup> 李白鳳：《東夷禘考》（濟南：齊魯書社，1981 年，初版），頁 82-83。葉達雄：〈西周文、武、成、康時代的文治與武功〉，《西周政治史研究》（臺北：明文書局，1982 年，初版）。原載《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 3 期。

的證據可證明其與營維前的東征有絕對的關係。」<sup>50</sup>而從一些時代相近且敘述內容類似的金文中可以得知，小臣謎殷應該是屬於昭王時代的器物。<sup>51</sup>依目前所能得見的金文，與小臣謎殷同樣記載平定東夷大反者共有三件，<sup>52</sup>分別為罍鼎（《集成》5.2740）、<sup>53</sup>寔鼎（《集成》5.2731）、<sup>54</sup>保鼎殷（《考古》1991年第7期<sup>55</sup>），現將銘文逐錄於下：

（11）隹王伐東尸（夷），濂（濂）公令罍罍史旗曰：以師氏罍有嗣後或（國）或伐腺。罍俘貝罍用作（作）匏公寶尊鼎。（罍鼎）

（12）王令趙馘（捷）東反尸（夷），寔肇從趙征，攻禽（踰）無帝（敵），省于人身，俘戈，用作寶尊彝，子子孫孫其永寶。（寔鼎）

<sup>50</sup> 何樹環：《西周對外經略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0年12月，頁96。

<sup>51</sup> 彭裕商：《年代》，頁274-277。

<sup>52</sup> 楊寬在《西周史》中列舉「康王平定東夷大反和北征」相關的器共八件，除了小臣謎殷之外，其他為罍鼎、寔鼎、旅鼎、魯侯尊、呂壺、師旅鼎、保鼎殷。其中呂壺及師旅鼎實是記載伯懋父北征之器，故不當列入其中。參見氏著：《西周史》，頁524-527。劉雨在〈西周金文中的軍事〉一文附錄中，列舉昭王時代東征的器分別為小臣謎殷、明公殷、罍鼎、寔鼎、保員鼎。參見氏著：〈西周金文中的軍事〉，《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年11月，初版），頁228-239。又，彭裕商在《年代》中，列舉「東征及相關諸器」共六器，分別為小臣謎殷、保鼎殷、罍鼎、嗣鼎、寔鼎、魯侯尊。其中嗣鼎因不涉及東征的相關記載，故本文不列入討論。參見氏著：《年代》，頁274-277。其中旅鼎學者一般認定為成、康時期器，故不列入本文討論範圍。又罍鼎、寔鼎、保鼎殷銘中皆謂征伐者為「東尸」或「反尸」，而魯侯尊則謂「伐東或」，我們以為魯侯尊所記載之事有可能與其他四器不同，故暫不將其列此討論。

<sup>53</sup> 《集成》定為西周早期，《大系》定為成王，《史徵》定為昭王，《銘文選》定為康王，《人名》西周康、昭時期，《年代》定為昭王。本文依據《史徵》、《年代》之見，將此器定為昭王時代。

<sup>54</sup> 《集成》定為西周中期，《大系》定為成王，《史徵》定為昭王，《銘文選》定為康王，《人名》定為西周早期，《年代》定為昭王。本文依據《史徵》、《年代》之見，將此器定為昭王時代。

<sup>55</sup> 張光裕：〈新見保鼎簋銘試釋〉，《考古》1991年第7期，頁649-652。《年代》定為昭王。本文依據《年代》之見，將此器定為昭王時代。

(13) 隗王既賚，厥伐東夷。在十又一月，公反自周。己卯，公在戲，保鼎遷，犀公錫保鼎金車，曰：用事，隗于寶殷。用鄉公逆洧（造）吏（事）。（保鼎殷）

在(11) 寧鼎中可以得知濂公派遣寧與史旗參與伐東夷之役。(12) 寔鼎則是王命趙「捷東反夷」，作器者寔則是隨趙出征。<sup>56</sup> (13) 保鼎殷記載犀公在周天子伐東夷之後自周返回，可知犀公應該也是參與此次的征夷之役；而作器者保鼎受賞金車，也有可能是因立戰功之故。依據以上銘文的內容可知，在此次征伐東夷的戰役中除了(1) 小臣謎殷中所記載的伯懋父之外，尚有其他人員參與作戰。由於此三器銘文只記載有關作器者自己部份的事蹟，因此往往讓人乎略了他們與伯懋父所率領之殷八自的關係。而小臣謎殷的作器者小臣謎是統領殷八自的伯懋父之直接下屬，因此在銘文中便以整體殷八自的立場記載戰事；相對地，寧鼎、寔鼎、保鼎殷的作器者是以自己的立場記述戰事，因此在銘文中只記述所屬諸侯及個人的事蹟而已。

(11) 至(13) 等三器中出現了一些人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場由伯懋父為首出征東夷的軍隊之組成結構。以下我們將三器中出現的人物分為四個等級論述。(11) 寧鼎中的濂公及(13) 保鼎鼎中的犀公史籍未見，但在元年師旅殷（《集成》8.4279）<sup>57</sup>中可見「徯公」，「徯」應是「犀」字的繁化，則「徯公」應是此器「犀公」的後裔。既然濂公及犀公皆稱之為「公」，皆應當是周王室的重臣或臣。<sup>58</sup>據此則三器中除了(12) 寔鼎的趙身份不明外，其

<sup>56</sup> 趙尊（《集成》11.5992）、趙卣（《集成》10.5402）銘文云：「隗十又三月辛卯，王才序（岸），易趙采曰趙，易貝五朋。趙對王休，用乍姑寶彝。」馬承源以為「或為軍功之賞」，或有可能與出征東夷之役有關。參見氏著：《銘文選》，頁62。

<sup>57</sup> 《集成》定為西周晚期，《史徵》定為懿王，《銘文選》定為孝王，《人名》西周中期後段，《斷代》定為西周中期約當夷王前後器，《年代》定為厲王，李學勤：〈論西周中期至晚期初金文的組合〉（以下簡稱〈組合〉）定為孝王。李學勤：〈論西周中期至晚期初金文的組合〉，《社會科學戰線》2000年第4期，頁252-267。

<sup>58</sup> 傅斯年：〈論所謂五等爵〉，《民族與古代中國史》，頁91-115。原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

他二位都是諸侯等級的人物。以上二位的身份較高，我們可以將之列為第一個等級。

(11) 罍鼎銘文云：「濂(濂)公令罍罍史旃曰：以師氏罍有嗣後或(國)或伐腺。」據此可知，罍與史旃是實際率領師氏及其有嗣參與作戰的將領，如此則罍及史旃應當是屬於第二等級的人物。(12) 憲鼎中的趙，從銘文作器者憲直呼其名而不加任何的稱謂，可以得知他應當不是諸侯或周王室的重臣。但從銘文中得知趙是由周天子親自派遣率軍出征，因此趙是口銜天命伐東夷，應該是周天子的心腹之臣被派往伯懋父軍前效力，在這裡也是屬於第二等級者。(13) 保鼎鼎銘文中有「保鼎邁」一句，張光裕認為是指保鼎「襄助鄉酉及有關事宜」，<sup>59</sup>據此可知其身份應當不至於太低。保鼎受犀公賞賜金車，<sup>60</sup>張光裕認為這是犀公對出征的隨員保鼎的賞賜，<sup>61</sup>我們認為這是正確的看法。據此，則保鼎可能也是直接承犀公之命而實際在戰場上指揮作戰的將領，在此也屬於第二等級的人物。

至於屬於第三等級者，在此三器中較不能明顯看出，但在(11) 罍鼎中記云：「濂公令罍罍史旃曰：以師氏罍有嗣後或或伐腺」，則師氏與有嗣實為罍及史旃的下屬。雖然器中未明言師氏及有嗣者之名姓，但由此則可知其為指揮系統中的第三等級。(12) 憲鼎銘文記云：「攻禽(踰)無啻(敵)，省于人身，俘戈」，可見憲也是在戰場上直接與敵軍廝殺的作戰者。憲明言其跟隨趙出征，從整個組成結構中也應屬於此等級的人物。至於憲是否也是師氏，由於材料不足也不可妄下定論。但從(11) 罍鼎的記載來看，應該可以確定他是趙的部屬，故能隨趙出征東夷。

我們於第一節中已說明，殷八自之命名除了因為其常駐於殷故地外，因為組成的份子是以殷遺民為主故名之為「殷」。王承紹在〈周代社會史試論〉

<sup>59</sup> 張光裕：〈新見保鼎簋銘試釋〉，《考古》1991年第7期，頁649-652。

<sup>60</sup> 在西周金文中尚有受賞金車之例，如獻殷（《集成》8.4205）、小臣宅殷（《集成》8.4201）及同貞（《集成》10.5398）。

<sup>61</sup> 張光裕：〈新見保鼎簋銘試釋〉，《考古》1991年第7期，頁649-652。



一文中提出殷人用「日名」的慣例，<sup>62</sup>日人白川靜〈周初殷人之活動〉、<sup>63</sup>張懋鎔〈周人不用日名說〉，<sup>64</sup>亦主張在金文中作器者用天干稱其祖考者皆為殷人。而(11)寧鼎中的史旗又見於員卣(《集成》10.5387)，<sup>65</sup>其銘文云：「員從史旗伐會，員先內邑。員孚金，用乍旅彝。」員又見於員方鼎(《集成》5.2695)，<sup>66</sup>其銘文云：「隹征(正)用既望癸酉，王獸(狩)于眡敷(廩)，王令員執犬，用乍父甲鬻彝。」員方鼎謂員「用乍父甲鬻彝」，可知員應當是殷人。而員又從史旗伐會，則史旗應當是員的上司，<sup>67</sup>即有可能尚有血源關係或是同屬一個氏族，因此可以推測史旗應當也是殷人。(12)寔鼎的作器者寔又見於寔作父丁卣(《集成》10.5209)，<sup>68</sup>可知其為殷人。由此可知，以上所引三器除了(13)保鼎設為新出之器，沒有更多的資料可以證實外，其他三器中實際參與征夷之役的史旗、寔均為殷人。雖然基層乃至於中階的軍士都是殷商遺民組成，但統率大軍的伯懋父卻是不折不扣的周人。因此我們可以說，殷八自其實是由周人統帥所率領，而由殷人組成的師旅。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將(11)至(13)器銘文中各人物的關係繪成圖，以展示其系統結構：

<sup>62</sup> 王承紹：〈周代社會史試論〉，《文史哲》1953年第1期，頁50-56。

<sup>63</sup> 日本·白川靜：〈周初殷人之活動〉，《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3卷·上古秦漢，頁122-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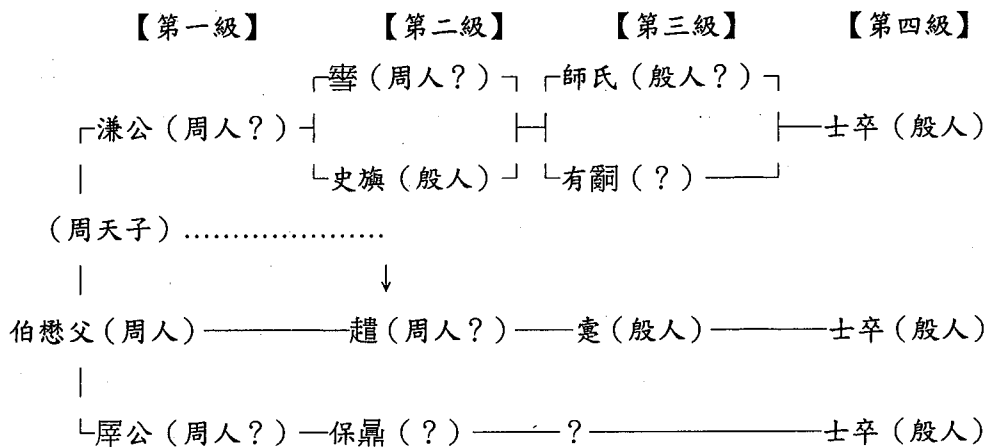
<sup>64</sup> 張懋鎔：〈周人不用日名說〉，《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6月，初版)，頁222。

<sup>65</sup> 《大系》定為成王，《集成》定為西周早期，《史徵》定為昭王時期，《銘文選》定為昭王時期，《斷代》定為西周早期，《年代》定為穆王。

<sup>66</sup> 《大系》定為成王時期，《集成》定為西周早期，《史徵》定為昭王時期，《銘文選》定為昭王時器，《斷代》定為西周早期，《年代》定為穆王。

<sup>67</sup> 馬承源：《銘文選》，頁78。

<sup>68</sup> 吳鎮烽：《金文人名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初版)，頁271。



從以上圖表中我們可以知道，伯懋父所率領的殷八自可以分爲四個層級。基本而言，屬於第二級者皆是由第一級所直屬授命的高階指揮將領，如(11)寧鼎記載寧及史旗直接受濂公之命出征。<sup>69</sup>至於(12)寔鼎的趙則是由周天子親派參與戰事，因此我們在此用虛線表示與周天子的從屬關係；但在戰場上他是受伯懋父節制，故以實線表是他與伯懋父的指揮關係。第三級者則是實際參與戰事的中階將領，是直接指揮由般人組成的殷八自的主要人物，因此他們本身也極有可能皆爲般人。第四級則是由般人組成，是直接與敵交鋒的士卒。透過這張圖表，可以清楚地了解在這場戰役中殷八自部隊的組成結構。至於殷八自的指揮系統及指揮權等問題，則留待下節中說明。

#### 四、指揮權問題

中國古代的作戰方式，自甲骨文記載以來均是以三個集團或方陣的方式列陣。<sup>70</sup>其中「自」可以分左、中、右，如：「丁酉貞：王作三自：右、中、

<sup>69</sup> 日本·伊藤道治：《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資料爲主的殷周史研究》，頁110。

<sup>70</sup> 劉釗：〈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字研究》第16輯，頁67-140。王貴民：《商周制度考信》，頁219-220。

左？」（《粹》597）、「丙申卜，貞：吐馬左、右、中，人三百？六月。」（《前》3.31.2）、「乙未卜，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與，左比曾？」（《綴二》162）、「其雉眾？吉？中不雉眾，王占曰弘吉。其雉眾？吉？左不雉眾，王占曰弘吉。其雉眾？吉？」（《前》5.6.1）。卜辭中又常見「三百射」，如：「登三百射？勿登三百射？」（《乙》751）、「勿令禽致三百射？」（《乙》7661）、「癸卯卜，爭貞：王令三百射？」（《丙》83）、「丙午卜，永貞：登射百，令奠，旋？」（《合集》5760）。由《合集》5760 條可以證明，射手每隊一百人，故「三百射」也是分作三隊列陣。<sup>71</sup>其他相關的名稱還有「右人」、「大右」、「中人」、「中」、「戍中」、「大中」、「大左族」等等，足見這種三分作戰的方式在殷商軍事中的普遍程度。<sup>72</sup>

在西周金文中，這種古老的作戰方式仍然保存著，如魯侯尊（《集成》定名為「明公殷」，7.4029）、<sup>73</sup>班殷（《集成》8.4341），<sup>74</sup>銘文云：

（14）隹王令明公釁三族伐東或（國），在邀，魯侯又（有）囧工（功），用作旅彝。（魯侯尊）

（15）隹八月初吉才宗周，甲戌，王令毛白更統韞公服，𠄎（屏）王立（位），乍四方亟（極），秉緜、蜀、巢命，易鈴、鑿，咸。王命毛公以邦冢君、土（徒）馭、𠄎人伐東國𠄎戍，咸。王命吳白曰：「以乃自左比毛父。」王命呂白曰：「以乃自右比毛父。」遣命曰：「以乃族從父征。」徃（？）韞衛父身。三年靜（靖）東國，亡不成眈（尤），天畏（威）否畀，屯陟。（班殷）

<sup>71</sup> 以上卜辭資料轉引自沈長雲：〈殷契「王作三師」解〉，《上古史探研》，頁 49-63。原載《文史》第 44 輯，中華書局，1998 年。

<sup>72</sup> 王貴民：〈晚商中期的歷史地位〉，《中國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頁 17-24。

<sup>73</sup> 《集成》定為西周早期，《大系》定為成王，《史徵》定為康王，《銘文選》定為康王，《人名》定為康王，《年代》定為昭王。

<sup>74</sup> 《集成》定為西周中期，《大系》定為成王，《史徵》定為穆王，《銘文選》定為穆王，《人名》定為穆王，《斷代》定為西周早期後段，《年代》定為穆王。

在(14)魯侯尊中周天子命明公以三族伐東國，明公應該是這次軍事行動的主帥。銘文中的魯侯應該是從明公出征，也就是三族之一，因此這裡的「族」應當如馬承源解釋為「氏族」。<sup>75</sup>由此可知，魯侯尊中的三族應當是指明公、魯侯及另一個未知的氏族。依據(15)班殷記載，周天子命毛公為主帥，令吳伯、呂伯隨同毛公征伐東國，也是三「族」為單位出擊作戰。雖然依據這兩件器銘，我們不能肯定是否有其他的部隊參與這兩次戰役，但若以古代民族常以「族」作為「族軍」<sup>76</sup>的事實視之，則極可能一個「族」即是一個作戰單位，因此魯侯尊及班殷中的「三族」極可能也應該是作三個集團方式作戰的實例。再者如史密殷（李啓良〈陝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sup>77</sup>）銘文云：<sup>78</sup>

(16) 隹十又一月，王令師俗、史密曰：「東征。」啟（會）南尸（夷）唐（盧）、虎迨（會）杞尸、舟尸萑惹，廣伐東或（國）齊白、族土、述（遂？）人，乃執昌（鄙）寬亞。師俗逵（率）齊白、述（遂）人左□伐長必；史密左，逵族人、釐（萊）白、禿，眉（殷）周伐長必，隻（獲）百人。對揚天子休，用乍朕文考乙白障殷，子=孫=其永寶用。  
（史密殷）


<sup>75</sup> 馬承源：《銘文選》，頁35。

<sup>76</sup> 王貴民：《商周制度考信》，頁209。

<sup>77</sup> 李啓良定為共、懿時期；吳鎮烽定為懿王，下限不會晚於夷王之世；張懋鎔定為宣王時期；張永山定為懿王；李學勤定為孝王。參見氏著：〈陝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3期，頁7-9。吳鎮烽：〈史密簋銘文考釋〉，《考古文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10月，初版），頁156-163。原載《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3期。張懋鎔：〈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義〉，《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頁24-33。原載《文物》1989年第7期。李學勤：〈史密簋銘所記西周重要史實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1年第2期，頁5-9。張永山：〈史密殷銘與周史研究〉，《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1月，初版），頁187-201。

<sup>78</sup> 本銘文隸定，參見何樹環：《西周對外經略研究》，頁111。

又如師寰段（《集成》8.4313）<sup>79</sup>銘文云：<sup>80</sup>

（17）王若曰：「師寰，（？），淮尸繇（舊）我賁晦臣，今敢博（搏）卒眾段（轄），反卒工吏，弗速（蹟）我東鄭（國）。今余令女達齊帀（師）、翼、釐（萊）、燹，尻（殷）左右虎臣正（征）淮夷。即質卒邦獸（酋）：曰冉、曰彝、曰鈴、曰達。」師寰虔不象（墜），夙夜卹卒牆事，休既又工（有功），折首斲鬕（執訊），無謀徒馭，馭孚士女羊牛，孚吉金。（師寰段·節錄）

（17）師寰段與（16）史密段銘文內容極為相近，學者以為當是記錄同一次的戰事。<sup>81</sup>據此可知，（17）師寰段中的師寰與（16）史密段中的師俗、史密，也是以三集團式的作戰方式平定以淮夷為首的叛亂事件。<sup>82</sup>足見在西周時期，以三個集團的作戰方式仍然存在。

這種作戰方式在記載春秋史事的《左傳》中更為普遍，如〈隱公五年傳〉曰：「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濬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sup>83</sup>又，〈桓公五年傳〉曰：「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sup>84</sup>又，〈僖公二十八年傳〉曰：「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

<sup>79</sup> 《集成》定為西周晚期，《大系》定為宣王，《史微》定為厲王，《銘文選》定為宣王，《人名》定為厲王，《斷代》定為西周晚期偏早時器，《年代》定為宣王。

<sup>80</sup> 本銘文隸定，參見何樹環：《西周對外經略研究》，頁116。

<sup>81</sup> 劉釗：〈談史密段銘文中的盾字〉，《考古》1995年第5期。何樹環：《西周對外經略研究》，頁116。

<sup>82</sup> 何樹環：《西周對外經略研究》，頁119。

<sup>83</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61。

<sup>84</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106。

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sup>85</sup>由此可知，自殷商時代甚至於更早的遠古開始，以三個集團的作戰方式便一直流行於中國，直至春秋時代仍是如此。王貴民認為這種作戰方式「是實戰的需要，兩軍對壘，佈置中軍主力與左右兩翼，進可以齊頭並進，合圍包抄；退可以互相掩護，彼此救應，故千古以來盛行不衰。」<sup>86</sup>

既然這種作戰方式盛行不衰，何以在西周金文中卻只見上引（14）魯侯尊、（15）班殷及（16）史密殷、（17）師寰殷等三個例子？我們認為這是因為銘文記載的不完全，導致我們對於這種作戰方式的認識過於片面，而誤以為只有這三例記載而已。在上文第三節中我們對於（1）小臣譚殷及相關金文中所記載伯懋父征東夷之事加以分析，將其組織結構繪成圖表呈現，這裡其實就有以三個集團方式的作戰形式。依據小臣譚殷的記述，伯懋父無疑是殷八自的領導，也是征伐東夷的主帥，其身份就如同（14）魯侯尊中的明公、（15）班殷中的毛公及（17）師寰殷中的師寰。至於（11）簠鼎的濂公及（13）保鼎鼎的犀公，在這場戰役中的任務是協同伯懋父出征作戰，受伯懋父節制指揮，其身份就如同（14）魯侯尊中的魯侯、（15）班殷中的吳伯、呂伯及（16）史密殷中的師俗、史密。

我們再回到第三節最後所繪製的組織系統圖表。從這套指揮系統中可以知道第一級的人物是受周天子之命指派的重臣、諸侯，在戰役結束後這些重臣、諸侯自然歸建原處，與殷八自的關係也就結束。第二級的人物則是由第一級的重臣、諸侯指派指揮軍隊的高階將領，在任務結束後自然也跟隨重臣、諸侯離開殷八自，也不再與殷八自有任何的關係。至於第三級的師氏則是殷八自的直接指揮官，平時即是駐守在各自的長官，而在戰事發生時則接受由周天子派任的重臣、諸侯，及由重臣、諸侯派任的第二級人物指揮。在

<sup>85</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272。

<sup>86</sup> 王貴民：《商周制度考信》，頁221。

戰事發生時，殷八自隨著這些師氏分屬各重臣、諸侯指揮；換句話說，也就是分屬在三個作戰的集團之下。據此可知，這套指揮系統雖然是固定的結構，但在第一級、第二級中的人物是可以變動的，而第三級與第四級的關係則是常存。但這些第一級的重臣、諸侯雖然看起來似乎是獨立存在的一個單位，但實際上在戰事發生時並非單打獨鬥的獨立作戰，而是有一位總指揮官加以調度節制。舉上文征伐東夷的戰事為例，這位總指揮官應當就是（1）小臣謎殷中所記載的伯懋父。因此我們在第三節中所繪製的圖表中稍為將伯懋父的位置提前，正表示他具有總指揮官的地位。總而言之，在戰事發生時雖然八自分屬於由周天子派任的重臣、諸侯擔任指揮的三個作戰集團中，但在他們之中仍有一位是屬於總指揮官的地位，負責擊劃戰略及統領所有的軍旅作戰。

依據（1）小臣謎殷的記載：「白懋父以殷八自征東尸……白懋父承王令」，可以知道伯懋父以殷八自征東夷是由周天子授命領兵。伯懋父除了此次的東征之外，師旂鼎（《集成》5.2809）<sup>87</sup>記載云：「隹三月丁卯，師旂眾僕不從王征于方。鬲（雷）事（使）畢友弘呂告于白懋父，才葬。白懋父迺罰得夏古三百孚，今弗克畢罰。懋父令曰：義（宜）敕（播），其又內（納）于師旂。弘呂告中史書。旂對畢質于尊彝。」可知伯懋父也曾領兵北伐。又，李學勤有〈靜方鼎與周昭王曆日〉一文，認為伯懋父也曾隨昭王南征楚國，鬻尊、召卣所記載即是南征時事。<sup>88</sup>而我們在第三節中曾稍提伯懋父的身份，依據學者們的看法，認為他有可能就是後來的祭公謀父，但在征東夷之時尚未繼位為君。因此就伯懋父此時的情況而言，伯懋父的地位頗為崇高，因而能受命率領殷八自成爲統帥。

<sup>87</sup> 《集成》定爲西周中期，《大系》定爲成王，《史徵》定爲穆王，《銘文選》定爲康王或昭王，《人名》定爲成王，《斷代》定爲康王前後器，《年代》定爲穆王。

<sup>88</sup> 李學勤：〈靜方鼎與周昭王曆日〉，《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

在(2) 𣪗貯段中我們可以看到另一位總指揮官——東宮。東宮又見於效卣(《集成》10.5433)、<sup>89</sup>效尊(《集成》11.6009)、<sup>90</sup>習鼎(《集成》5.2838,《集成》定名為「𣪗鼎」),<sup>91</sup>將銘文逐錄於下:

(18) 隹四月初吉甲午,王𣪗(觀)于嘗。公東宮內(納)卿(饗)于王。王易公貝五十朋,公易畢涉(世)子效王休貝廿朋。效對公休,用作寶尊彝。烏虜,效不敢不邁年夙夜奔走揚公休,亦其子子孫孫述(永)寶。(效卣、效尊)

(19).....昔饑歲,匡眾畢臣廿夫,寇習禾十秭,以匡季告東宮。東宮迺曰:求乃人,乃弗得,女匡罰大。匡迺詣首于習,用五田,用眾一夫曰嗑,用臣曰彘、曰肫、曰奠,曰:用茲四夫,詣首曰:余無卣(由)具寇正(足)【秭】,不出,鞭余。習或(又)以匡季告東宮,習曰:必隹【朕禾】是賞(償)。東宮迺曰:賞習禾十秭,遺(饋)十秭,為廿秭。來歲弗賞,則付冊秭。迺或(又)即習:用田二,又臣一夫,凡用即習田七田、人五夫。習覓(免)匡卅秭。(習鼎)

銘文中的「東宮」,馬承源、劉雨認為即是後世的太子,郭沫若、吳鎮烽則認為是人名。<sup>92</sup>張亞初、劉雨則認為:

<sup>89</sup> 《集成》定為西周中期,《大系》定為孝王,《史徵》定為穆王,《銘文選》定為恭王,《人名》定為西周早期後段,《斷代》定為西周中期偏早時器,《年代》定為穆王。

<sup>90</sup> 《集成》定為西周中期,《大系》定為孝王,《史徵》定為穆王,《銘文選》定為恭王,《人名》定為西周早期後段,《斷代》定為西周中期偏早時器,《年代》定為穆王。

<sup>91</sup> 《集成》定為西周中期,《大系》定為孝王,《銘文選》定為懿王,《人名》定為西周中期後段,《年代》定為厲王,《組合》定為懿王。

<sup>92</sup> 馬承源:《銘文選》,頁103。劉雨:《西周金文中的軍事》,《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頁228-239。郭沫若:《大系》,頁101。吳鎮烽:《人名》,頁140。



銘文中的「王令東宮追以六師之年」、「以匡季告東宮」之東宮是官名或人名，而不是宮室之名。效卣稱「公東宮」，東宮能率領西六師出征，能處理旨（筆者按：本文隸定為「旨」）與匡季的糾紛，他的地位是很高的。劉心源指出：「『東宮』，太子也，《詩·碩人》疏：『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令觚》二·二七）劉氏之見可備一說。我們從東宮稱公這一點推測，東宮也許不一定是太子，東宮可能是指居于東宮之某種職官名。這個職官尚待研究。<sup>93</sup>

張、劉二氏之見我們認為極有啓發性，效卣、效尊既稱為「公東宮」，則應當是為職官之名才是。類似的情況在西周金文中尚可得見，如作冊虢卣（《集成》10.5432）<sup>94</sup>銘文云：「隹公大史見服于宗周年，才二月既望乙亥，公大史咸見服于辟王，辨（遍）于多正。孚四月既生霸庚午，王遣公大史，公大史才豐，賞乍冊虢馬，揚公休，用乍日己旅尊彝。」又，公大史作姬盞方鼎（《集成》4.2339）銘文云：「公大史作姬盞方鼎寶尊彝。」銘中稱「公大史」者，即是一般金文中所謂的「大史」。<sup>95</sup>又如旅鼎（《集成》5.2728）<sup>96</sup>銘文云：「隹公大保來伐反尸年」，「公大保」即召公奭，一般在金文中則作「大保」。<sup>97</sup>若依據「公大史」及「公大保」的構詞方式，則「公東宮」的「東宮」也應當如「大史」、「大保」是為官名。由此可知，（2）𣪗貯殿中的「東宮」也是職官之稱，既非太子也非人名。東宮一職在典籍中不見，因此具體的職權

<sup>93</sup> 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頁48-49。

<sup>94</sup> 《史徵》定為穆王，《銘文選》定為西周早期，《人名》定為西周早期，《斷代》定為西周早期偏晚，《年代》定為昭王。

<sup>95</sup> 「大史」一詞可見於中方鼎、大史奢甗、大史疊、鬲从盪、番生殷、毛公鼎等器。參見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頁76。

<sup>96</sup> 《集成》定為西周早期，《大系》定為成王，《史徵》定為昭王，《銘文選》定為康王，《人名》西周成康時期，《斷代》定為西周早期成康時，《年代》定為成王。

<sup>97</sup> 「大保」一詞可見於備鼎、大保殷、鬻鼎、大保方鼎、董鼎、大保戈、叔隋器、作冊大方鼎、御正良爵、樹殷。參見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頁60。

內容不能詳知。而從大史、大保在西周官制中地位甚高，故加上「公」字以表尊敬；若依此推之，東宮亦有加上公字之例，也可以知道東宮的地位應當不致於太低。總而言之，東宮是西周時期王廷的重臣應該是不會錯誤的。依據𣥂貯殷銘文記載，由於巢的進犯騷擾，因此周天子命東宮以六自軍旅追擊之。由此可知，這位擔任東宮職位者也曾為西六自的總指揮官，其角色與(1)小臣謎殷中的伯懋父相同。只是在這次追擊巢的事件並沒有太多的資料可以討論，因此對於整個戰事的過程與結果未能清楚地了解。我們認為東宮是周天子的重臣，因此在這次事件中周天子命令東宮以六自出擊，可知是由周天子直接授命東宮，與(1)小臣謎殷中的伯懋父相同。

除了(1)小臣謎殷、(2)𣥂貯殷有明確記載八自、六自的總指揮官外，再者就是(3)盞方尊、盞方彝中的盞。盞方尊、盞方彝銘云：「王冊令尹，賜盞：赤芾、幽兗、攸勒，曰：用嗣六自、王行、參有嗣：嗣土、嗣馬、嗣工。」「嗣」即「司」字，《說文》云：「司，臣司事於外者」；《玉篇》云：「司，主也」；《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傳》曰：「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預注云：「司，主也。」<sup>98</sup>據此可知「嗣」為主持、掌理之意，則銘中所謂的「嗣六自」者，我們以為即是掌理六自之意。盞方尊、盞方彝銘文在六自之下又有「王行」及「參有嗣」，應當也是盞管轄的範圍。其中「參有嗣」我們已於第四節中說明，即是指總理六自參有嗣的冢嗣土、冢嗣馬、冢嗣工。「王行」一詞在目前已發現的金文中僅此一見，典籍中亦無記載。《周禮·夏官司馬·序》：「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鄭玄注云：「行謂軍行列。」<sup>99</sup>《毛詩·魏風·汾沮洳》曰：「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毛傳云：「公行，從公之行也。」鄭玄箋云：「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sup>100</sup>《左傳·宣公二年傳》曰：「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

<sup>98</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242。

<sup>99</sup>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頁429。

<sup>100</sup>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頁208。

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sup>101</sup>據此可知，在典籍中則有「公行」一詞。杜預注「公行」云：「掌率公戎行者也」，且謂公族、餘子、公行「皆官也」；<sup>102</sup>而日人竹添光鴻則以為三者「皆族也，非官名」；<sup>103</sup>楊伯峻則認同杜預之見，謂為「晉國官名」。<sup>104</sup>事實上《左傳》傳文已說明清楚，是「宦」卿的嫡子、餘子、庶子。又，此段下文記曰：「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sup>105</sup>楊伯峻以為「旄車之族即餘子，亦即公路」；<sup>106</sup>是趙盾以公族大夫之位讓予趙括，也就是傳文中的屏季，而自己擔任旄車之族一職。據此則可知，公族、餘子、公行皆為官名。「公行」是諸侯國君的屬官，故名之為「公」；依此原則，盩方尊、盩方彝銘文中的「王行」應當也是職官名，是為周天子的屬官。

至於「王行」意義為何，歷來學者有不同的看法。<sup>107</sup>張亞初、劉雨則謂：「王行即由王族組成的軍隊，它本應是軍隊名。此銘文中的王行可能已轉化成管理王行的職官名，就如中行、右行那樣。當然，『王行』有可能就是指周王的直屬部隊。這裡暫且把它列為職官名，以待將來出土材料來驗證。」<sup>108</sup>我們以為張、劉二氏之見基本上可以信從，組成王行的人員有可能與《左傳》所記載晉國的公行類似，即是由周王室的庶子充任。而盩方尊、盩方彝銘文中的「王行」極有可能是職官之名，也就是管理這些由王室庶子所組成之單位

<sup>101</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 366。

<sup>102</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 366。

<sup>103</sup> 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臺北：天工書局，1998年8月），頁 696。

<sup>104</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7年1月，景印一刷），頁 112。

<sup>105</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 366。

<sup>106</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666。

<sup>107</sup> 郭沫若：〈盩器銘考釋〉，《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頁 1-6。李學勤：〈論西周金文的六師、八師〉，《華夏考古》1987年第2期，頁 207-210。馬承源：《銘文選》，頁 229。張永山：〈史密殷銘與周史研究〉，《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頁 187-201。劉雨：〈西周金文中的軍事〉，《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頁 228-239。

<sup>108</sup> 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頁 19。

的主官。既然王行是由周王室的人員所組成，在身份上顯然是高於參有嗣；但由於這些人員已派入六自中作為一個戰鬥單位，因此在銘文中的位置在六自之後、參有嗣之前。在上文第二節中我們已經說明，所謂的「西六自」即是由西土周人所組成的部隊；而從盨方尊、盨方彝中我們則可以得知，這些西土周人也包括了「王行」的王室子弟在其中。依據銘文的內容可知，盨在當時受到周天子冊命，負責掌理六自的事務；換句話說，盨也就是西六自的總指揮官。除此之外，銘文下段又云：「王令盨曰：翏嗣六自罽八自執」，是盨尚有其他兼職。銘文中的「執」即一般所見的「藝」字，學者對於「藝」字的意義則有不同的看法，<sup>109</sup>關於此部份並非本文討論的重點，故暫不在此細述。總而言之，盨的職權與地位極高，但可惜在史冊中未留下任何記載。

以上所論述的三個例子，是目前可以得知六自或八自的總指揮官。雖然這三位總指揮官的身世未能完全清楚，但可以得知他們皆是由周天子直接派任，應該可以算是周天子的心腹之臣或即是王朝的執政重臣。<sup>110</sup>在時代方面，（1）小臣謎段屬於昭王時期，伯懋父的活動時代一般皆認為在昭王、穆王；（2）戣貯段的時代在穆王時期；（3）盨方尊、盨方彝則是定在懿王、孝王時代。因此我們可以作一個結論：至少從周昭王至周孝王，六自、八自的指揮權均掌握在周天子手中，周天子可以派任大臣擔任六自、八自的總指揮官。六自、八自是直屬於周天子的武裝力量，周天子能完全掌控軍隊的指揮權；其所代表的意義是周天子掌握一定的軍事力量，在實際的政治實力考量下維持優勢。雖然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已謂昭王時代「王道衰缺」，

<sup>109</sup> 郭沫若：〈盨器銘考釋〉，《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頁1-6。于省吾：〈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自」和「八自」及其屯田制〉，《考古》1964年第3期，頁152-155。李學勤：〈論西周金文的六師、八師〉，《華夏考古》1987年第2期，頁207-210。馬承源：《銘文選》，頁229。

<sup>110</sup>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頁416。

懿王時代「王室遂衰，詩人作刺」，<sup>111</sup>也有學者認為西周時代從穆王已經開始衰弱，<sup>112</sup>但軍權在握的周王室仍是實際號令諸侯的天下共主。

## 五、與「△自」之關係

接續著上節的討論，我們談到西周金文中常出現的「△自」。在上文所引用的諸器中已出現二例「△自」的記載，即（1）小臣譏段的「鬯自」與「牧自」。而依據郭沫若的看法，小臣譏段中的「牧自」即是武王克商於「牧野」的「牧」，<sup>113</sup>地在今河南省淇縣以南一帶。<sup>114</sup>由此可知，金文中「△自」的「△」應當是指地名無疑。關於「自」字的解釋，誠如在前言中所載，以往許多學者均作過不同的說法，也針對此字的構形、本義作過許多的分析與討論。若從金文中「△自」的辭例來說，則「自」字實與軍旅駐紮有關，因而郭沫若謂「自字當即屯聚之屯，師戍所在處也」；<sup>115</sup>徐中舒謂「凡軍旅所在之地皆可稱自」；<sup>116</sup>金祥恆先生則云：

《說文》：自，小阜也。是自本係小阜之形，卜辭皆假為師，訓眾。金文亦然。自本小阜，何以有師旅之意？蓋上古之世，都邑必賓附丘陵

<sup>111</sup>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68、70。

<sup>112</sup>日本·伊藤道治：《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資料為主的殷周史研究》，頁 113。  
徐中舒：〈西周史論述（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 年第 4 期，頁 92-100。夏含夷：〈西周之衰微〉，《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 11 月，初版），頁 120-126。又見氏著：《溫故知新錄：商周文化史管見》（臺北：稻禾出版社，1997 年 9 月，初版），頁 149-156。王玉哲：《中華遠古史》，頁 722。

<sup>113</sup>郭沫若：〈小臣譏段銘考釋〉，《金文叢攷》（東京：文求堂書店，1932），頁 330-338。

<sup>114</sup>陳美蘭：《西周金文地名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 6 月，頁 150-151。

<sup>115</sup>郭沫若：《大系》，頁 3。







<sup>116</sup>徐中舒：〈遯敦釋考〉，《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頁 182-204。

以築。章太炎嘗撰古者天子居山說，以為太上之君王，相宅度邑，必于山麓，此說雖近新奇，然證以古代地名之名丘、名州、名陵者甚多，知所說殆不盡虛。度邑所在，又即軍旅所在。友人童丕繩為余言，西歐中古之世，城邑多築於高原，名之曰堡，封君及軍衛居焉，所以周封域而禦外侮也。上古中原有洪水之患，民非高土不可以居；是以都城所在，必宅於高原，是或亦一因也。自本小阜與丘陵同，古代帝王宅丘陵以配天，居師衛以鎮眾，王者之居，軍旅所守，古軍旅亦可曰自，于是自字遂含有師旅之義，凡从自得聲受意之字，遂亦引申其眾意。<sup>117</sup>

至於作為小阜的「自」和師旅的「自」的關係，胡厚宣、劉釗、劉節、李學勤、裘錫圭、王恩田等均有成說，在此則不再贅述。<sup>118</sup>總而言之，自與軍隊有著必然的關係這是毋庸置疑的。

在西周金文中以「△自」方式出現的詞彙數量不在少數，據筆者統計有京自、古自、疆自、朽自、整自、臺自、周自、斃自、齊自、鬻自、商自、甕自、牧自、斃自、永自、炎自、誥自、成自等共十八例之多。以下則將此十八例的銘文節錄於下：

<sup>117</sup> 金祥恆：〈從甲骨卜辭研究殷商軍旅制度中的三族三行三師〉，《金祥恆先生全集》第二冊（臺北：藝文印書館），頁475-534。

<sup>118</sup> 胡厚宣：〈卜辭地名與古人居丘說〉，《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臺北：大通書局）。劉釗：〈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字研究》第16輯（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9月，初版），頁67-140。劉節：〈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論〉，《中國古代氏姓制度研究》（上海：上海書局，1996年，初版）。李學勤：〈論西周金文的六師、八師〉，《華夏考古》1987年第2期，頁207-210。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與建築有關的兩個詞——「門塾」與「自」〉，《出土文獻研究續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初版），頁1-4。王恩田：〈釋（自）、（官）、（師）〉，《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246-251。王恩田：〈釋（自）、（官）、（師）補證〉，《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7年10月，初版），頁811-822。

白名	器名	銘文內容
一、京白	克鐘（《集成》1.204-205、206-207）	適經東至于京白。
	晉姜鼎（《集成》5.2826）	魯覃京白。
	多友鼎（《集成》5.2835）	隹十月，用玁狁方興，廣伐京白，告追于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白，武公命多友率公車羞追于京白。……復奪京白之俘。……武公迺獻于王，迺曰武公曰：「女既靜京白，釐女，易女土田。」……公親曰多友曰：「……多擒女靜京白。」
二、古白	邁甗（《集成》3.948）	師雍父戍在古白。
	稭卣（《集成》10.5411）	稭從師雍父戍于古白。
三、噩白	中甗（《集成》3.949）	在噩白腓。
	靜方鼎（日本出光美術館《館藏名品選》第三集，編號67）	卑女鬲才侖（曾）白。
四、朽白	作冊鼎（《集成》4.2504）	康侯在朽白。
五、整白	旅鼎（《集成》5.2728）	公在整白。
六、臺白	玆方鼎（《集成》5.2789）	隹九月既望乙丑，才臺白。
	玆殷（《集成》8.4322）	隹六月初吉乙酉，才臺白。
七、周白	師農鼎（《集成》5.2817）	王在周白泉宮。
	免殷（《集成》8.4240）	令女疋周白鬲斲。
	大師盧殷（《集成》8.4251）	王在周白量宮。
	師餘殷蓋（《集成》8.4277）	在周白泉宮。
	師賁殷蓋（《集成》8.4283）	王在周白鬲馬宮。
	諫殷（《集成》8.4285）	王在周白泉宮。

	癘盥（《集成》9.4462）	王在周自象宮。
八、燹自	善鼎（《集成》5.2820）	令女左疋龔侯，監燹自戎。
九、齊自	妊小段（《集成》8.4123）	伯芳父事鞞犢尹人于齊自。
	史密段（《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3期）	齊自卒土（徒）、遂人乃執鄙寬亞。
十、鬻自	利段（《集成》8.4131）	王在鬻自。
十一、商自	穆公段蓋（《集成》8.4191）	迺自商自復還至于周。
十二、鬻自	小臣譚段（《集成》8.4238）	戲東尸大反，白懋父以般八自征東尸，唯十又二月，遣自鬻自，述東隄，伐海眉，雩卒復歸在牧自。
十三、牧自	小臣譚段（《集成》8.4238）	戲東尸大反，白懋父以般八自征東尸，唯十又二月，遣自鬻自，述東隄，伐海眉，雩卒復歸在牧自。
十四、斂自	趙段（《集成》8.4266）	命女乍斂自豕嗣馬。
十五、永自	鬻比盥（《集成》9.4466）	王在永自田宮。
十六、炎自	召卣（《集成》10.5416）	隹九月，在炎自，甲午，伯懋父賜鬻白馬、舛黃、嬭微。
	鬻尊（《集成》11.6004）	隹九月，在炎自，甲午，伯懋父賜鬻白馬、舛黃、嬭微。
十七、訃自	象父卣（《集成》10.5419）	女其以成周師氏戍于訃自。
	鬻尊（《集成》11.6008）	爰從師雍父戍于訃自之年。
十八、成自	競卣（《集成》10.5425）	隹白犀父以成自即東。
	小臣單解（《集成》12.6512）	王後返克商，在成自，周公易小臣單貝十朋。



雖然上列共有十八例「△自」形式的詞彙，但透過一些簡單的繫聯可以發現有重複之處，如三、古自的遇甗記載云：「師雍父戎在古自」，而十七、𠄎自的𠄎尊則記云：「爰從師雍父戎于𠄎自之年」，兩器皆出現師雍父，可知古自即是𠄎自。又，八、𠄎自之「𠄎」字，譚戒甫、孫作雲認為即是「𠄎」之本字；<sup>119</sup>十四、𠄎自，後者只是「𠄎」加上「攴」旁的繁化，可知亦是指同一處。<sup>120</sup>據此可知，上列表格中實際是十六個例子。

自既然是軍事的據點，則一定有駐紮軍隊於此。而在自駐紮的軍隊，其長官一般均稱之為「師○」，學者認為即是典籍中所稱的「師氏」。<sup>121</sup>但必須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師○」都是所謂的「師氏」。<sup>122</sup>我們見《周禮·地官·師氏》中所陳述的職掌內容，其文曰：

師氏掌以媯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

<sup>119</sup>譚戒甫：〈先周族與周的遷徙及其社會發展〉，《文史》1979年第6期。孫作雲：〈說𠄎在西周時代為北方軍事重鎮——兼論軍監〉，《河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1期，頁31-49。

<sup>120</sup>伊藤道治將趙殷銘中的「𠄎自」及善鼎銘中的「𠄎自」繫聯一起論述，可知伊藤氏亦將兩自視為一處。參見氏著：《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資料為主的殷周史研究》，頁113。

<sup>121</sup>斯維至：〈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中國古代社會文化論稿》（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年4月，初版），頁188-222。原載中國文化研究所編：《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7卷，1947年。王貽梁：〈「師氏」、「虎臣」考〉，《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3期，頁61-65、76。楊善群：〈西周銘文中的「師」與「師氏」〉，《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2期，頁35-39。

<sup>122</sup>日本·伊藤道治：《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資料為主的殷周史研究》，頁118。王貽梁：〈「師氏」、「虎臣」考〉，《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3期，頁61-65、76。

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旦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sup>123</sup>

《周禮》中所記的師氏是不折不扣的文武全能，既管文治亦能武功。對於《周禮》記載的真實性，學者都曾加以討論。<sup>124</sup>而對於「師」的職掌，學者也從金文內容中加以分析，但主要仍是以軍事為主。<sup>125</sup>不管如何，師氏在早期的西周金文中是以軍事為主要的職掌則是不爭的事實，而兼理文治很可能是後來的演變。

在上表列舉的西周金文中，我們可以知道「師○」與「△自」似乎有某種程度的關係。如遇甌記載：「師雍父戎在古自」，馭尊記云：「爰從師雍父戎于訃自之年」，則師雍父是駐守於古自的軍事將領。又，師農鼎記云：「王才周自泉宮，旦，王各大室，即立。嗣馬共右師農，入門，立中廷。王乎乍冊尹冊命師農：疋師俗嗣邑人。」由此可知周自的駐守將領為師俗，而師農則是輔佐師俗管理邑人。又，師癘段蓋銘云：「王才周自嗣馬宮，各大室，即立。嗣馬井白親右師癘，入門，立中廷。王乎內史吳冊令師癘，曰：先王既令女，今余隹隴先王令，令女官嗣邑人、師氏。」銘文中冊命師癘，令他治理邑人及其他師氏，可見其應當是周自的駐守將領。至於「邑人」一詞，甲骨文中已見，宋鎮豪認為「邑人」在卜辭中的意義是「以族氏組織相集約，大體由所

<sup>123</sup>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頁 210-212。

<sup>124</sup> 郭沫若：〈周官質疑〉，《金文叢攷》（東京：文求堂書店，1932），頁 60-92。顧頡剛：〈「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文史》第 6 輯。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5 月，初版），頁 7。楊善群：〈西周銘文中的「師」與「師氏」〉，《考古與文物》1990 年第 2 期，頁 35-39。汪中文：《兩周官制論稿》（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3 年 10 月，初版），頁 70。

<sup>125</sup> 日本·白川靜：〈周初殷人之活動〉，《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3 卷·上古秦漢，頁 122-149。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頁 4-5。楊善群：〈西周銘文中的「師」與「師氏」〉，《考古與文物》1990 年第 2 期，頁 35-39。汪中文：《兩周官制論稿》，頁 70。李零：〈西周金文中的職官系統〉，《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 11 月，初版），頁 202-214。

謂『氏族』和『氏』兩方面人組成。」<sup>126</sup>楊寬認為是類似於《周禮》鄉大夫的職官名，<sup>127</sup>張亞初、劉雨則認為「邑人」一詞可能是泛稱，因此「是指城邑之人而言，似不宜釋為職官名。」<sup>128</sup>至於日人松井嘉德則認為「邑人」即先秦典籍中常見的「國人」，「是表示一種身份的詞匯」。<sup>129</sup>晁福林的意見與之相類，認為邑人是「屬於周族的里邑之人。」<sup>130</sup>據此可知，理論上而言應當每個自都有至少一位「師○」作為軍事長官；<sup>131</sup>而且很可能他們除了軍事方面的工作，也兼為管理國人等地方事務的長官。<sup>132</sup>還有另一件值得我們注意，在西周金文中的「師○」都是由周天子直接冊命，如上引師農鼎的師農、師癘殷蓋中的師癘皆是其證。<sup>133</sup>據此可知，師氏的職權大小與地位升降不管在歷史上的變化如何，都是由周天子直接任命，足見其必須深受周天子信賴，藉此也可知道其對周天子的重要性。

至於這些自與六自、八自的關係又為何？我們認為上列的這些自，其中絕大部份即是屬於六自、八自的下轄單位。換句話說，所謂的六自、八自即是由六個、八個「自」所組成的軍團，意即六自、八自並非只是一個「點」的駐紮，而是一個涵蓋較大區域的「面」。若以後世的情況說明之，則猶如現今海巡署中的「南巡局」，其所涵蓋的區域廣及整個南台灣，其轄下的各級單位分布於南台灣各地。一支大規模的部隊在駐守時絕對沒有團聚在一個點上的道理，一定是依據部隊的編制分駐於各區域；如此既可以使防禦的範圍擴

<sup>126</sup>宋鎮豪：〈商代邑制所反映的社會性質〉，《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4期，頁57-65。

<sup>127</sup>楊寬：〈論西周金文中「六自」「八自」和鄉遂制度的關係〉，《考古》1964年第8期，頁414-419。

<sup>128</sup>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頁52-53。

<sup>129</sup>日本·松井嘉德：〈西周時期的「國」〉，《第二次西周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597-606。

<sup>130</sup>晁福林：《先秦社會形態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初版），頁403-404。

<sup>131</sup>王貴民：《商周制度考信》，頁223。

<sup>132</sup>曹璋：〈周代善夫職官考辨〉，《第二次西周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82-294。

<sup>133</sup>其他例子可參見汪中文：《西周冊命金文所見官制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1999年4月，初版），頁309-312。

大，必要時也可以相互支援。這種軍事觀念在古今中外流傳甚久，因此西周時代六自、八自的情況也應當如此視之。(2) 盞方尊、盞方彝銘文云：「賜盞：赤芾、幽亢（衡）、攸（筮）勒，曰：用嗣六自、王行、參有嗣：嗣土（徒）、嗣馬、嗣工（空），王令盞曰：飄嗣六自眾八自執（藝）。」銘文中的盞地位頗高，周天子令他司掌六自、王行及參有嗣。必須注意的是，這裡所謂的參有嗣是各個自中各別都有的，<sup>134</sup>如趙啟銘文云：「命女乍斨自豕嗣馬」，是趙被任命為斨自的豕嗣馬。又如(11) 簠鼎銘云：「濂（濂）公令簠眾史旗曰：以師氏眾有嗣後或（國）或伐腺」，師氏後接「有嗣」，即是指師氏所屬的下屬有嗣，也就是盞方尊、盞方彝中的「參有嗣」。而(3) 留壺蓋銘文中謂：「更乃且考，乍豕嗣土于成周八自」，「豕嗣土」者應當就是總理各自嗣土之人，也就是成周八自中的嗣土之長。<sup>135</sup>據此推之，則八自中應當還有豕嗣馬、豕嗣工之職，總理八自之下各自的嗣馬及嗣工。而盞方尊、盞方彝中記載盞總理六自及其參有嗣，即是總理「六自」所屬六個「自」的參有嗣，如此則可知所謂的「六自」其實即是六個自所組成，也才能解釋所謂「六」、「八」的數字意義。

至於六自、八自究竟是指由哪些自所組成？以目前所見的資料尚未能解決這個問題，但從一些零星的金文內容中仍可追尋一二。如(1) 小臣譔啟銘云：「自懋父以殷八自征東尸，唯十又二月，遣自鬻自，述東隄，伐海眉（湄），掣卒復歸在牧自。」伯懋父身為殷八自總指揮，銘文中謂伯懋父由鬻自出師而歸於牧自，可知鬻自、牧自是屬於殷八自的兩處。<sup>136</sup>又，鬻尊及召卣銘文內容相同，其云：「隹九月，在炎自，甲午，伯懋父賜鬻白馬、蚌黃、楛微。」伯懋父在此銘中則是在炎自賞賜物品予鬻，可知炎自亦屬於殷八自的

<sup>134</sup>李學勤：〈郟縣李家村銅器考〉，《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7期，頁58-59。

<sup>135</sup>于省吾：〈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自」和「八自」及其屯田制〉，《考古》1964年第3期，頁152-155。

<sup>136</sup>依據陳美蘭考證，牧自在今河南淇縣。鬻自雖未確切地點，但陳氏以為當在東方。參見氏著：《西周金文地名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6月，頁150-151、164-166。

範圍。<sup>137</sup>但我們必須要強調的是，在上表中所列的這些自並非全數都屬於六自、八自，有部份也可能是獨立於六自、八自之外的單位。如表中第四的噩自，李學勤考訂在今日湖北省的鄂城。<sup>138</sup>由於中甗與中方鼎、中觶等器均是記載周昭王南伐荆楚之事，銘中的噩自已經接近南方，故當不屬六自或八自的範圍之內。<sup>139</sup>有些自則因時代先後的關係，也不可能屬於六自、八自。如第十一的鬻自載於利殷，而利殷是記載武王克商之事，學者均將此器時代定為武王時代。六自、八自的建立時間雖然並不十分明確，但也不可能在武王克滅殷商之初即可完成，因此鬻自在武王之時也不可能屬於六自、八自之列。

## 六、八自之移防

在上文第二節中提及六自、八自的名號問題，我們認為西周時期只有一支六自及一支八自，殷八自、成周八自不是同時並存的兩支部隊。之所以有殷八自、成周八自的名稱，是因為部隊移防之後為了能「名符其實」，故將部隊的名號也作更動；因此駐紮在殷地時稱之為「殷八自」，移防至成周時則改稱為「成周八自」。至於從八自稱「殷」、「成周」，並不如李明道所認定是因為八自常轉換駐守地點，故時而稱「殷八自」、時而稱「成周八自」。<sup>140</sup>我們認為八自的駐守地在西周中期時是常駐於殷地，但後來則因為防務的需求而移防至成周，自此以後極可能便常駐成周而未再移回殷地。

在穆王時期的金文中有二件器向來學者皆認為與「成周八自」有關，我們以為其實並不然。首先是象絺卣（《集成》10.5419），其銘文云：

<sup>137</sup> 依據陳美蘭考證，炎自在今山東鄒城。參見氏著：《西周金文地名研究》，頁162-164。

<sup>138</sup> 李學勤：〈靜方鼎考釋〉，《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頁223-230。

<sup>139</sup> 彭裕商：《年代》，頁261-262。

<sup>140</sup> 李道明：〈六師、八師新探〉，《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5期，頁64-70。

(20) 王令𢆶曰：「戲！淮尸敢伐內國，女其呂成周師氏戎于𠄎白。」  
白(伯)雍父蔑𢆶曆，易貝十朋。𢆶拜誦首，對揚白休，用作文考乙公寶尊彝。(𢆶𠄎白)

𢆶𠄎白銘文中的「𢆶」、「𢆶」以往有學者認為是同一人，<sup>141</sup>但其實𢆶應是𢆶的下屬，而𢆶即是銘中的伯雍父。<sup>142</sup>𢆶又見於𢆶段(《集成》8.4322)及𢆶方鼎(《集成》5.2824)，<sup>143</sup>其銘文云：

(21) 隹六月初吉乙酉，才壘白戎伐𢆶，𢆶達有嗣、師氏徯(奔)追𢆶(襲)戎于馘(械)林，博(搏)戎獸。(𢆶段·節錄)

(22) 𢆶曰：「烏虜！王隹念𢆶辟刺(烈)考甲公，王用肇事(使)乃子𢆶逯(率)虎臣御(禦)灘(淮)戎。」(𢆶方鼎·節錄)

伊藤道治認為(21)𢆶段「記錄的是率領有司和師氏，方鼎的銘文中記錄的是率領虎臣，可以認為這二次對戎的征伐不在同一時期。」<sup>144</sup>但我們以為另一個𢆶方鼎(《集成》5.2789)銘文記云：「隹九月既望乙丑，才壘白」，而(21)𢆶段曆日為「六月初吉乙酉」；從乙酉日至乙丑日共為一百日，可以符合六月初吉至九月既望的日數。據此可知，這一系列由𢆶所製作的青銅器當是同時所作，也可知(20)𢆶𠄎白銘中謂𢆶所率領的「成周師氏」者即是(22)𢆶方

<sup>141</sup>汪中文有〈「伯𢆶」與「𢆶」、「𢆶伯𢆶」諸器間系聯問題之檢討〉一文詳載各家之說，共分為三種看法：(1)以𢆶伯𢆶、𢆶、伯𢆶、𢆶為同一人；(2)𢆶即𢆶伯𢆶，𢆶伯𢆶與伯𢆶可能是父子關係；(3)伯𢆶即𢆶，即師雍父(筆者按：即伯雍父)，𢆶是𢆶的下屬，𢆶伯𢆶屬另一組。參見氏著：〈「伯𢆶」與「𢆶」、「𢆶伯𢆶」諸器間系聯問題之檢討〉，《大陸雜誌》第79卷第3期，頁139-144。

<sup>142</sup>何樹環：《西周對外經略研究》，頁191-194。

<sup>143</sup>《集成》定為西周中期，《史徵》定為穆王，《銘文選》定為穆王，《人名》定為穆恭時期，《斷代》定為穆王前後，《年代》定為穆王。

<sup>144</sup>日本·伊藤道治：〈壘鼎銘及其社會意義〉，《第二次西周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64-472。

鼎銘中的「虎臣」。「虎臣」典籍稱為「虎賁」，《尚書·顧命》曰：「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偽孔傳云：「虎臣，虎賁氏。」<sup>145</sup>《毛詩·大雅·常武》曰：「進厥虎臣，臣闕虓虎」，鄭玄箋云：「虎臣之將。」<sup>146</sup>《史記·周本紀》云：「（筆者按：武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司馬貞《集解》引孔安國云：「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sup>147</sup>據此可知，虎臣之名即取其勇猛若虎之意，是為驍勇善戰的精兵部隊。虎臣一詞在金文中見於師酉段（《集成》8.4289）、<sup>148</sup>匍段（《集成》8.4321）<sup>149</sup>及師克盪（《集成》9.4467），<sup>150</sup>其銘文云：

（23）王乎史牆冊命師酉：「嗣乃且啻官邑人、虎臣、西門尸、囊尸、秦尸、京尸、弇身尸。」（師酉段·節錄）

（24）王若曰：「匍！不顯文武受命，則乃且奠周邦。今余令女啻官嗣邑人、先虎臣後庸、西門尸、秦尸、京尸、囊尸、師筭側新、□華尸、由□尸、鬲人、成周走亞、戎秦人、降人、服尸。」（匍段·節錄）

（25）王曰：「克，余佳壘乃先且考克鞫臣先王，昔余即（既）令女，今余佳鬪臺乃令，令女更乃且考鞫嗣左右虎臣。」（師克盪·節錄）

又，《周禮·夏官》中有「虎賁氏」，其職云：「掌先後王而趨之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閤。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

<sup>145</sup> 題西漢·孔安國注、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頁275。

<sup>146</sup>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頁693。

<sup>147</sup> 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63。

<sup>148</sup> 《集成》定為西周中期，《大系》定為懿王，《史徵》定為恭王，《銘文選》定為恭王，《人名》定為懿王，《斷代》定為西周晚期。

<sup>149</sup> 《集成》定為西周晚期，《史徵》定為恭王，《銘文選》定為恭王，《人名》定為懿孝時期，《斷代》定為西周中期偏晚約當恭懿時器，《年代》定為厲王。

<sup>150</sup> 《集成》定為西周晚期，《史徵》定為厲王，《銘文選》定為孝王，《人名》定為孝夷時期，《斷代》定為西周晚期厲王前後，《年代》定為宣王。

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sup>151</sup>上引三器銘文中的作器者師酉、匄及師克之下皆掌理虎臣，或即是《周禮》中的虎賁氏，為眾虎臣之首長。必須要注意的是，銘文中的師酉、師克既為虎臣之長，皆為「師」級之官；匄殷的匄在銘文中雖未名為「師」，但學者們以為師詢殷中的師詢即匄殷中的匄，<sup>152</sup>可知匄也是師級的人物。從此可知在西周時期虎臣之長也稱為師某，亦即所謂的「師氏」。據此可知，(20) 彖斂卣銘文中所載的「成周師氏」者即是虎臣之長，而非指成周八自。關於虎臣成員的身份，有學者認為是由四夷之人及罪隸組成，有人則持反對的意見。<sup>153</sup>當然這個問題不是本文的論述重點，但可以確定的是虎臣的職責主要有二，一者為「捍禦王身作爪牙，為王之禁衛」；二者「必要時奉命出征」。<sup>154</sup>(22) 斂方鼎即是虎臣奉周天子之命，隨斂出戍于甘自。總而言之，我們不可將(20) 彖斂卣等器所記載的師氏誤認為與成周八自有關。

再者即是競卣（《集成》10.5425），其銘文云：

(26) 隹白犀父呂成自即東，命戍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才斲。白犀父皇競各（格）于官。競蔑曆，賞競章（璋）。（競卣·節錄）

<sup>151</sup>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頁474。

<sup>152</sup> 郭沫若：〈弭叔簋及匄簋考釋〉，《文物》1960年第2期，頁5-6。王祥：〈說虎臣與庸〉，《考古》1960年第5期，頁33-36。黃盛璋：〈關於詢殷的製作年代與虎臣的身分問題〉，《考古》1961年第6期，頁330-333。李福泉：〈匄殷銘文的綜合研究〉，《湖南師院學報》1979年第2期，頁58-66。吳鎮烽：《人名》，頁197。彭裕商：《年代》，頁411。

<sup>153</sup> 王祥：〈說虎臣與庸〉，《考古》1960年第5期，頁33-36。黃盛璋：〈關於詢殷的製作年代與虎臣的身分問題〉，《考古》1961年第6期，頁330-333。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頁14-15。尙志儒：〈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彘夷」問題〉，《第二次西周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31-242。

<sup>154</sup> 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頁15。



競卣的作器者競，彭裕商認為即是馭尊（《集成》11.6008）中的仲競父。<sup>155</sup>而馭尊銘文記云：

（27）隹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馭從師雍父戍于訃自之年，馭穰曆，仲競父易赤金。（馭尊·節錄）

則競又曾隨師雍父戍於訃自，與上文所舉（20）彘斝卣諸器亦可繫聯。因此彭裕商認為師雍父與伯犀父可能同時，也可能略有先後。<sup>156</sup>在上文中我們討論（20）彘斝卣銘文中的「成周師氏」為虎臣而非指成周八自，競卣的時代又與之相同或相近，則銘中的「成自」者應當也非指成周八自，而應與彘斝卣相同皆是指虎臣才是。因此我們可以作一推測，若伯雍父與伯犀父為同時之人，則兩人應是同時受命且同領成周的虎臣前往禦敵；若伯雍父的時間略早於伯犀父，則伯犀父應是繼伯雍父之後成為統帥。總而言之，競卣銘中的「成自」應與彘斝卣的「成周師氏」相同，均指虎臣而與成周八自無關。據此可知，至少在周穆王時八自仍駐紮於殷地，而尚未移駐成周。

然徐中舒卻認為殷八自在穆王之時可能就已經退駐西土，我們認為其說並不可信。為了論述方便，今將徐氏之論逐錄於下：

以殷八師鎮撫東夷，這原是適應西周初期的軍事措施。後來王室衰微，情況就有所改變，尤其是周夷王命衛為侯，就說明王室的力量，不僅實際上就是名義上也已經退出殷都了。殷八自可能是在此時以前，可能還在穆王時代（作者自注：因盞尊有司六自暨八自語）就已經退駐西土。當時殷八自如果不撤退，它就有可能落入衛人之手，而禹鼎記載對噩用兵，也不能同時調發西六師和殷八師了。<sup>157</sup>

<sup>155</sup> 彭裕商：《年代》，頁307。

<sup>156</sup> 彭裕商：《年代》，頁308。

<sup>157</sup>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徐中舒歷史論文選集》，頁994-1020。

徐氏認為西周王室共領有三支部隊，即西六自、殷八自及成周八自，我們在第二節中已經彙錄其說於注釋之中。徐氏謂殷八自在穆王時爲了避免統領之權落入「衛人」手中，因此將殷八自遷駐西土，顯然這裡的「衛人」應是指衛侯。但必須要注意的是，我們在第四節中已經說明，目前可知的六自、八自統帥皆是由周天子親自派任，而且皆是由王朝的卿士或大臣擔任；因此這兩支直屬於王室的勁旅事實上一直都是由周天子親自掌控，更遑論會落入衛侯手中。再者，徐氏謂殷八自移駐西土，其實只是推測之語，並沒有任何的證據可以證明其事。若假使徐氏的推測可以成立，而如（4）禹鼎銘文記載，噩侯駸方協同南淮夷、東夷進犯南國、東國時，何以不就近派遣駐守成周的成周八自抵禦，又何必遠從西土調派西六自、殷八自奔波救急？足見徐氏的「兩八自」說及殷八師於穆王時期移駐西土的看法均有待商榷。因此我們仍主張西周王室僅有兩支直屬部隊，一支是西六自，一支是殷八自；而殷八自在移駐成周之後，即更名爲成周八自。

至於我們認為八自移駐成周的時間，據目前已見的金文可知，最晚在周厲王、宣王時的（5）匱壺蓋中已經稱爲「成周八自」，故可以確定在此時八自已從殷地移至成周。在（4）禹鼎銘文中記載噩侯駸方率南淮夷與東夷進犯南國、東國，由於對方來勢洶洶大舉入侵，因此周厲王派遣西六自與殷八自兩支部隊同時抵禦敵軍來犯。銘文中有「隸師彌朶（深）甸（會）匡（往），弗克伐噩」一句，以往學者多將「朶」字隸定作「宥」或「守」，因此解釋爲西六自、殷八自畏懼、害怕，或謂軍隊長守於「匡」（匡）地。然蔡哲茂先生認爲甲骨文的「𠄎」字是爲「深」的初文，<sup>158</sup>何樹環認爲此字由「𠄎」→「𠄎」→「𠄎」的演化，故禹鼎中的此字可隸定作「朶」而釋爲「深」。其中「彌」字可讀爲「靡」，爲否定之意；「甸」可通「迨」（會）；「匡」則讀作「往」；則銘文整句的意思就是「軍隊會集往伐不夠深入，未達到周王對

<sup>158</sup>蔡哲茂：〈釋「𠄎」、「𠄎」〉，《故宮學術季刊》1988年第5卷第3期。

伐鄂之師『勿遺壽幼』的要求。」<sup>159</sup>何氏之見，我們以為極具啓發性，這也說明了何以八自會從駐守殷地而移防的關鍵原因。厲王時期與南方諸夷國的爭鬥愈加激烈，這點可以從禹鼎銘文記載一次動用六自與八自兩支部隊看出，足見周王室在武力上的優勢正在消失之中，因此不得不同時動員兩支勁旅出擊。但由於八自駐防殷地及其周邊地區，對於從南方進擊的噩侯駘方過於遙遠，因此才導致六自與八自無法順利集結深伐噩師。雖然在禹鼎的銘文記載中禹本身是大獲全勝，但整體而言周王室的六自與八自則未必如此順利，可能在兵員上應該折損不少。

八自駐防殷地最主要的目的正如學者所云，是爲了「對付東夷」或「東方的敵人」。<sup>160</sup>從目前已知的西周金文中，依據馬承源的統計，與東征有關的器共有十件，分別爲保卣（《集成》10.5415）、壘方鼎（《集成》5.2739）、禽殷（《集成》7.4041）、鞞切尊（《集成》11.5977）、旅鼎及本文所引用的（1）小臣謎殷、（9）饗鼎、（14）魯侯尊、（10）寔鼎、（15）班殷，<sup>161</sup>其年代皆集中在西周早期，最晚也不超過穆王時期。而有關向南方征戰的金文則有二十六件，分別爲乍冊矢令殷（《集成》8.4300）、饗尊、過伯殷（《集成》7.3907）、執駘殷（《集成》7.3976）、小子生尊（《集成》11.6001）、肅殷（《集成》6.3732）、中方鼎（《集成》5.2785）、彖絨卣、絨方鼎、絨殷、遇甗、甗鼎（《集成》5.2721）、彖作辛公殷（《集成》8.4122）、稻卣（《集成》10.5411）、鬲尊、競卣、猷鐘（《集成》1.260）、虢仲盃蓋（《集成》9.4435）、無旻殷（《集成》8.4225）、敵殷（《集成》8.4323）、噩侯

<sup>159</sup>何樹環：《西周對外經略研究》，頁188-189。

<sup>160</sup>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徐中舒歷史論文選集》，頁994-1020。原載《考古學報》1959年第3期。徐中舒：〈西周史論述（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4期，頁92-100。李學勤：〈論西周金文的六師、八師〉，《華夏考古》1987年第2期，頁207-210。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頁416。

<sup>161</sup>馬承源：《中國青銅器銘文選集》，《中國青銅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初版），頁67-105。原載《上海博物館館刊》第1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鼎（《集成》5.2810）、（4）禹鼎、麥生盥（《集成》9.4459）、兮甲盤（《集成》16.10174）、（17）師寰殷、駒父盥蓋（《集成》9.4464），時間均集中在昭、穆、厲、宣四朝。但必須要注意的是，昭王時代與南方荆楚的戰事，如作冊矢令殷至肅鼎等諸器所記載，皆是由周族主動進擊。但穆王時代的南淮夷勢力驟強，已「敢伐內國」（彛彛卣）進犯周王室的勢力範圍，因此周天子方派軍南下壓制，可參見彛彛卣至競卣等諸器。但穆王時期對於淮夷的策略仍是以戍防為主，因此銘文中多是用「戍」、「御」<sup>162</sup>等偏向防禦性的動詞記載軍事行動。<sup>163</sup>學者認為這樣的舉動意味著西周的國力至穆王時已經開始衰退，<sup>164</sup>所以必須在可以容忍的情況之下減少戰事的發生。《尚書·呂刑》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sup>165</sup>李學勤在〈〈嘗麥〉篇研究〉一文中認為穆王時即有刑書存在，也就是後來《左傳·昭公六年傳》中所謂的《九刑》；<sup>166</sup>又，《史記·周本紀》謂穆王時政局「復寧」，<sup>167</sup>《國語·周語》也記載穆王對犬戎用兵，並「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雖然「自是荒服者不至」，<sup>168</sup>但基本上而言穆王時代周王室在內政與對外武功方面還能維持一定的局面。<sup>169</sup>厲王時南方的戠子（獸鐘）、南淮夷（戠殷）、噩侯駿方（噩侯鼎）都曾進犯周疆，甚至於內侵至核心地區的「陰陽洛」，即「成周的腹心伊洛地區」。<sup>170</sup>因此厲王還會南往親征戠子，直到戠子的都城。張亞初謂從

<sup>162</sup> 銘文用「戍」者，如彛彛卣、邁卣、稻卣、馭尊、競卣。銘文用「御」者，如彛方鼎。

<sup>163</sup> 劉雨：〈西周金文中的軍事〉，《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頁 228-239。

<sup>164</sup> 胡志祥：〈西周對淮夷政策初探〉，《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9 年第 1 期，頁 84-89。

<sup>165</sup> 題西漢·孔安國注、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頁 295。

<sup>166</sup> 李學勤：〈〈嘗麥〉篇研究〉，《第二次西周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37-145。

<sup>167</sup> 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68。

<sup>168</sup> 三國·韋昭注：《國語韋昭註》，頁 11。

<sup>169</sup>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6 月，一版二刷），頁 300。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頁 421。

<sup>170</sup>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頁 994-1020；〈西周史論述〉（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9 年第 4 期，頁 92-100。

禹鼎銘文云：「烏乎哀哉！用天降大喪于下國」，可知「西周統治階級受到了嚴重威脅，感到極度恐慌。」<sup>171</sup>據此可知，從周穆王以降南方諸夷國便不斷地叛亂、騷擾，使得周王室必須花費更多的人力、物力與時間投入平叛的戰事上。由於戰事的需要，因此唯有將八自從原本駐防的殷地移至成周地區，以增加部隊防禦或進擊的機動效率。上引（5）匱蓋學者斷定為西周厲、宣時期器，（8）小克鼎則是宣王時期器，兩器均明載八自均駐防於成周；據此可知，八自自周厲王之後至宣王時便一直常駐於成周。

## 七、結語

經過上文的粗疏討論，將一些心得在此作一小結：

一、六自及八自的稱號，應是結合地域及族類兩種條件而名之；即西六自是由「西土之人」組成，並戍守於「西土」的師旅；殷八自是由殷商遺民組成，並駐紮於殷商故地的師旅。至於成周八自，則是殷八自在「隨地易名」之下的另一種稱號，因此是同一支部隊的不同稱法而已。

二、殷八自的組織系統可以分為四個層級，其中第一層級是由周天子派任的重臣、諸侯擔任，第二層即是這些重臣、諸侯的下屬人員擔任，第三及第四層級則是殷八自的師氏及殷人所組成。至於任務結束之後，第一層級及第二層級的重臣、諸侯及其屬員則回歸建制，第三及第四層級的殷八自師氏及殷人則回到原本的駐地，也就是回到各個「自」中繼續駐守。

三、六自、八自的指揮權總體而言是由周天子掌握，實際上則是由周天子派任其所信賴的重臣擔任總指揮官。依據目前可以得見的西周金文分析，可知的總指揮官共有三位，即（1）小臣譚的伯懋父，曾任八自總指揮；（2）斨貯的東宮，曾任六自的總指揮；（3）盞方尊、盞方彝中的盞，曾任六自的總指揮。

<sup>171</sup>張亞初：〈周厲王所作祭器斨盞考——兼論與之相關的幾個問題〉，《古文字研究》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1月，初版），頁151-168。

四、所謂的「六自」、「八自」者，實際上即是於西周金文中常見的「△自」所組成；意即「六自」是由六個自，「八自」是由八個自所構建的集團部隊。平時這些部隊分駐於各地，故單稱之可分別稱為「△自」，由師氏指揮管理。一旦周王室派任戰鬥任務時，各自則聽從周天子所遣任重臣、諸侯指揮而集體出動，故合稱則為「六自」、「八自」。

五、彖絨卣銘中的「成周師氏」及競卣銘中的「成自」，以往學者認為均是指成周八自。經本文考訂，「成周師氏」與「成自」應當是指虎臣，而與成周八自無關。

六、從周厲王之後，原本駐守在殷地的八自移防至成周地區，自此之後以至西周滅亡，八自未再回駐殷地而常守成周。八自移駐成周，我們以為其主要的目的在於加強成周地區的防務，以抵禦南方的淮夷等外族的進犯。

# Some Problems on Liu-Shi and Ba-Shi

Huang, Sheng-song\*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investigate the internal problems of Liu-Shi (六自) and Ba-Shi (八自) of Xi Zhou (西周). It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1. denomination and definition; 2. components and structure; 3. the problem of the right to command; 4.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iu-Shi and Ba-Shi as well as “△ Shi”; 5. the shift for garrison duty of Ba-Shi. The conclusion will be brought out in five points: 1. Xi-Liu-Shi (西六自) and Yin-Ba-Shi (殷八自) are different denomination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regions and clans. As for Yin-Ba-Shi and Cheng-Zhou-Ba-Shi, they are distinct names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of “the change of names in reliance of locations,” while the fact is that they differ in names but not in kind. 2. The chain of command of Yin-Ba-Shi consists of four hierarchies: the first includes major courtiers and vassals dispatched by the Zhou Emperor; the second the subordinates of these major courtiers and vassals;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the Shi-shi (師氏) and the Yin people of Yin-Ba-Shi. 3. The Zhou Emperor holds the right to command Liu-Shi and Ba-Shi and also the right to designate those among the major courtiers to serve as general commanders. 4. Liu-Shi and Ba-Shi are actually formed by those who are often seen in Xi-Zhou-Jin-Wen, “△ Shi”: Liu-Shi means six Shis while Ba-Shi signifies the

---

\* Huang, Sheng-song is a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at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army group formed by “Shi.” 5. Since Zhou, Li Emperor, the Yin-Ba-Shi originally stationed in Yin shifted to the Cheng-Zhou (成周) area, hence the term Cheng-Zhou-Ba-Shi (成周八自) afterwards. Cheng-Zhou-Ba-Shi never returned to Yin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hey were responsible for defending against the invasion of foreign tribes such as Huai and Yi in the South.

**Keywords :** Liu-Shi, Ba-Shi, Shi-shi